

第四章 蘇軾對唐代詩人的接受內涵

引言：

本章所要探討的，是蘇軾如何去面對唐代詩人的為人以及詩風。在前代諸多大家的影響下，蘇軾如何保有自我觀念地去接受唐代詩人？通常人們很容易犯了人云亦云的過錯，一個詩名極大的詩人往往會被人盲目推崇，而一開始寂寂無名的詩人，則很容易被人所遺忘。然而顯然的，蘇軾並非一般人，他在評價及接受唐代詩人時，並沒有受前人太大影響，反而有些人還是因他的另眼看待而從此在中國詩歌史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蘇軾對唐代詩人的接受，實在影響後代人對唐代詩壇看法甚鉅。

上一章談到，蘇軾對唐代詩人的接受，根植於他自我的接受心理，而我們也得出蘇軾三個主要的接受心理。本章將討論到蘇軾對唐代各詩人的接受程度，亦即蘇軾對該詩人是否有好感？原因是什麼？是根據哪些接受心理？而這些蘇軾對其有好感的人物是否有共通特性？經由蘇軾對唐代詩人的評論與接受，對唐代詩史是否產生影響？這些都是本章所期望探討的問題。

首先，唐代詩人雖多，但蘇軾有提及者，卻僅數人。尤其在詩文集中大量談及者，更是少數，主要有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白居易五人；其餘尚有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孟郊、賈島諸人，但提及文字相當少，有些甚至僅有隻字片言。基於此，本章將分為七節，前五節分別探討蘇軾詩文集中談論較多的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白居易五人；第六節則談論蘇軾對其餘唐代詩人的接受，計有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孟郊、賈島、劉叉、皮日休、陸龜蒙等人；第七節為小結，總結前六節，並探討蘇軾接受之唐代詩人的共通性，以及對唐代詩史的影響。由於對唐代詩史的影響此議題太過龐大，且影響部分並非本論文討論接受行為的範圍，因此在這裡僅大略提及，至於深入的探討，則有待諸君另作研究。

第一節 對李白的接受內涵

李白的詩名，早在其活著的時候已傳遍天下。李陽冰〈草堂集序〉即說：

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李白）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過而不行，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¹

¹《李太白全集》下冊，卷三十一，頁1445。

極稱李白的改梁、陳舊風，振興唐朝詩體。因有此等功力，令李白名氣響遍整個京城。〈李翰林別集序〉說：

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秘監聞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步輦迎，如見綺皓。草和蕃書，思若懸河。帝嘉之，七寶方丈，賜食于前，御手調羹。于是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²

文中說到賀知章將李白推薦給玄宗皇帝，玄宗對其極為禮遇，甚至親手替他調羹。《楊妃外傳》又說：

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李白進〈清平調詞〉，高力士以脫靴為恥。帝嘗三欲命白官，卒沮止。³

李白受皇帝賞賜，竟連權傾朝野一時的宦官高力士也要為其脫靴，詩人至此殊榮，可說無以復加。由上述種種，可見李白詩名當時之盛。

李白詩名，不僅在當時已傳遍天下，就是到了宋朝，仍舊是眾所矚目的對象。即如蘇軾要推崇杜甫，也須推舉李白與之並立，而從中襯托出杜甫的偉大，其〈書黃子思詩集後〉即說：「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⁴又〈次韻張安道讀杜詩〉也說：「誰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掃地收千軌，爭標看兩艘。」⁵將杜甫與李白看齊，顯然是拿李白來加持杜甫，可知李白詩名從盛唐以來，一直高居不下。然而，在此眾人皆給予崇高地位的情形下，蘇軾如何去看待李白？

對李白的接受，如前所述，蘇軾與前人一樣都是給予極高評價的。蘇軾列李白與杜甫同為古今詩人之冠，其原因主要在李白詩的尚氣，與杜詩的重學力不同。李白的詩給人一種絕世脫俗的超然之感，那是一種傲視天下的豪邁不羈之氣，是道家特有的逍遙無礙之息。蘇軾所欣賞的，正是李白這一特點。李白五歲就看他父親的道家相關書籍，後來更隱居學道，那種道家逍遙任性，以及因求仙不成而心生的及時行樂思想早深植於他心中，這對李白的詩歌寫作是有很大影響的。學道讓李白有成仙的冀望，而成仙之難則讓李白產生及時行樂的思想，求仙與及時行樂正是李白詩歌中常見的兩個重要內涵。

及時行樂並不是不重視生命，而是在看透生命本質後的一種應對機制。既然長生是很困難的，那所僅有的時光顯得更為可貴，李白不因生命的短暫而感到害

²《李太白全集》下冊，卷三十一，頁 1454。

³《蘇軾詩集》第三冊，卷十九，頁 980。

⁴《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頁 2124。

⁵《蘇軾詩集》第一冊，卷六，頁 265。

怕，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把握當下，積極樂觀的及時行樂精神，這需要有相當大的勇氣，才能坦然地去面對生命有限的事實，李白在求仙之餘，確實做到了這點。李白的求仙是一種挑戰，和秦始皇等的怕死是不同的。秦始皇是貪戀人間的美好、自我的霸業，因此希望能有長久的歲月來享受、維持；而李白希求的卻是一種生命得到超脫的仙人境界，可以遨遊四海，不散不滅。從李白的入京而不留戀名利，順性而不巴結高官即可看出，李白的求仙長生確實不是爲了貪戀人間名利，而是一種更高的追求生命解脫情懷。蘇軾正是被李白這種不被命運打倒，能夠樂觀進取面對人生、把握當下的氣勢所吸引。蘇軾也喜道家，從小就覺得莊子與之有所契合，蜀人天性也使蘇軾不慕榮利，講求任性自在，因此對李白這一個性，自然起了一種仰慕之情。蘇軾對李白的不羈之氣，即十分讚賞，其〈書韓李詩〉說：

書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戲謂柳生，李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可一大笑。⁶

文中蘇軾說李白看到山壁間所書的字跡，崇尚的是那些字書寫的氣勢磅礴，即使不知道所寫爲何，但仍爲其澎湃的筆勢給吸引。李白不因不認識就失去鑑賞美好事物的能力，反而能從字跡錯落間的氣勢，看出巖間作品的雄偉，這種尚氣的精神，正是蘇軾所推崇的。一般人看到書法作品，都是猜測其所寫是什麼字，只有書法家或有素養的觀眾，才會注意到字畫間所蘊藏的氣勢，留意到空白間的配置美感，李白正是這類中人，其對書法如此，對詩的創作亦然。蘇軾對李白這種尚氣的審美趣味感到認同，乃是對李白任意不羈的精神態度予以讚賞，表面笑其不識字，內裡卻是對其尚氣給予極高肯定。尚氣是一種不會拘泥於小事，而對整個大局作一宏觀的閱覽，用更高的一個角度來看待世間萬物，做到如此，則天地間便沒有可以羈絆自己的事，自然就能更爲逍遙、更爲自在，這就是尚氣的精神所在，也是蘇軾所推崇李白的原因之一。

那何以蘇軾對李白這一尚氣精神會如此推崇呢？當然，前面已說過，蜀人天性使得蘇軾早年即有道家歸隱思想，且產生一股不慕人間榮利的氣概，這與李白的那股尚氣精神，顯然是相通的。然而除此之外，後天境遇的變化，對蘇軾而言，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宋代文士因大環境的侷限，國力的先天衰弱，使得文士在對外的立功上難有重大作爲；加上小人的當權，在內也難以施展治國安民的抱負。建功安民既然已成爲登天之事，轉而尋求自我人格的提升與超脫便成爲宋代文士積極努力的目標，理學的發達與此多少有關，蘇軾的處世哲學，更是由此鍛鍊而來。世人皆醉，在朝廷中多是小人當權的情況下，蘇軾如何去面對這一切？隨波逐流不是他的本性，積極的參與政治，替百姓請命才是蘇軾的宏願。這樣的蘇軾，對李白那種不囿於權貴，而使高力士爲其脫靴的氣概，自然是欽羨不已。對李白

⁶《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頁2111。

的「飄逸絕塵」⁷，不與世人同昏的任性精神，更是多所嚮往。由於這層原因，蘇軾對李白的尚氣精神，顯現出推崇、仰慕的心理。

當然，如果純粹只是道家修己思想所散發的那種逍遙不羈之氣，是難以令蘇軾欽佩至此的。以蘇軾而言，其一生浸濡在儒、道、佛三家思想之中，李白若只擁道家思想的人格特質，是難以讓蘇軾贊不絕口的。那李白究竟還有什麼樣的特質是蘇軾所認同的？究其原因，除了道家人格特質，只剩儒家人格特質了。李白自小就有任俠之氣，常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氣，他後來追隨永王麟失敗後，之所以沒被賜死，就是因任俠時救了郭子儀的緣故。可見李白的仗義精神一直存在其心中，而這與儒家的濟世救民精神正是相通的。李白這股豪情，正好符合了蘇軾對有志之士的崇尚心理，蘇軾對李白的接受，正是處於政事上不得志的時期，對其他唐代詩人如杜甫、白居易等亦然。蘇軾藉由對李白的推崇，抒解了一些自己鬱悶不得志的心情，也藉以肯定自我的人生價值。

如前所說，蘇軾之所以推崇李白，一來自於李白的道家人格特質符合了蘇軾崇尚道家思想的心理，一來由於李白的俠義精神符合了蘇軾對有志之士的推崇心理。然而最重要的，還是在於李白散發出的那種忘懷得失，堅持自我理想的性格，吸引了蘇軾。不論是李白尚氣的表現，還是對達官貴族的隨意指使，或行俠仗義，或求仙求道，或襄助永王，或吟嘯江湖，這一切都顯示出李白那種既憂民憂國，又忘懷得失的生命性格。如果不憂民憂國，又如何會行俠仗義，襄助永王；如果不忘懷得失，又如何能頤指達官貴族，尚氣自適？而這一特質，正是蘇軾對李白最為推崇的地方，我們可以在蘇軾〈王定國詩集序〉得到很好的證明，他說：

今定國以余故得罪，……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⁸

蘇軾將王定國與李白並舉，而極力稱讚李白後三百年而有王定國的詩篇。由文中之王定國雖因罪被貶，其心情、創作卻不受影響，而與在做官時的樣子相仿。這說明了王定國立志為國為民之心相當堅定，也表現出王定國時時刻刻都在為民著想，不因一時的困挫而失去他的熱情，也不因一時遭貶而患得患失。蘇軾在稱讚之餘，正顯露出對自我的期許，自己也曾有一顆熱切的入世之心，不應因環境而

⁷ 蘇軾〈書學太白詩〉曰：「李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節自《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頁2098。

⁸ 《蘇軾文集》第一冊，卷十，頁318。

有所改變，作法可以不同，那顆心卻是不容失去的。這裡蘇軾不管是對王定國的稱許，還是對自己的期許，主要強調的是一種忘懷得失的心。堅定自我的意志，不因外在環境的變化而隨之起伏，用則行，不用則隱；不怨天，不尤人，但無愧於心。不得志時，仍然能坦然地「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這樣的一種忘懷得失的心態，正是蘇軾所讚賞的。而蘇軾他人不舉，偏舉李白以相對應，由此可看出蘇軾對李白的推崇，最主要正由於李白這一顆與王定國一樣憂國憂民而又忘懷得失的心。

總之，蘇軾對李白的接受，主要來自於他道家思想的建構，以及對有志之士的崇敬心理。在兩相影響的情形下，發展出一種既憂民憂國，又能忘懷得失的心態，那是一種尚氣的表現，亦即堅持自我理想而不畏外在逆境的精神。李白的這種特質吸引了蘇軾，使蘇軾對李白人格的接受，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第二節 對杜甫的接受內涵

蘇軾對杜甫的接受，可說鮮有間言，除晚年轉喜陶淵明，將陶置於李、杜之上外⁹，杜詩在蘇軾心中，可說是古今第一，評價極高。〈次韻張安道讀杜詩〉即云：「誰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掃地收千軌，爭標看兩艘。」¹⁰將杜甫與李白看齊，同列詩中二冠。又〈書唐氏六家書後一首〉曰：「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¹¹更提出杜詩之「格力天縱」，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可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當然，蘇軾對於杜詩亦有批評處，如〈記子美陋句〉曰：「杜甫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真村陋也。」¹²直接指出杜詩亦有村陋之處。又〈書子美黃四娘詩〉曰：「東坡云：此詩雖不甚佳，可以見子美清狂野逸之態。」¹³雖是稱讚杜詩「清狂野逸」的另一風貌，卻也有「此詩雖不甚佳」的間言。然而此類話蘇軾詩文集中極少，總地來說，蘇軾對杜詩的評價是相當高的。

⁹蘇軾〈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曰：「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而實於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節自《蘇軾集》第三冊，《欒城後集》卷二十一，頁1110。又《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之〈五柳先生下〉曰：「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節自鍾嶸撰，司空圖撰，胡子撰：《鍾嶸詩品、司空詩品、苕溪漁隱叢話》（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年，台二版）合刊本第一冊，《苕溪漁隱叢話》，頁1。

¹⁰《蘇軾詩集》第一冊，卷六，頁265。

¹¹《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九，頁2206。

¹²《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頁2104。

¹³《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頁2103。

蘇軾對杜詩的認同與推崇，也可從他有意學杜詩、跟進杜詩上見一端倪。蘇軾屢有跟進杜甫之意，〈評七言麗句〉即曰：

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可以並驅爭先矣。軾亦云：「……」又云：「……」亦庶幾焉爾。¹⁴

談到七言詩之偉麗者，先言杜詩之美無人能繼，直至歐陽脩始能與杜詩並稱，後再提出自己的詩，有欲跟進前二人之意。蘇軾亦嘗說：「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樓明。』此古今絕唱，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樓明』為韻云：……」¹⁵稱許杜詩之「古今絕唱」，而跟進作五首次韻詩。從蘇軾對杜詩的認同與跟進，可知其對杜甫是極度推崇的，蘇軾對杜詩雖偶有間言，但他也說杜詩村陋處自「不能掩其善也」。¹⁶

既然蘇軾對杜詩評價那麼高，那究竟是看好杜詩的哪些特點？當然這與蘇軾是在什麼樣的接受心理下去接受杜詩有關，而蘇軾又是在什麼樣的接受心理下接受杜詩？亦即杜詩中有哪些特點是符合蘇軾的審美趣味？這是本節所要探討的重點。杜詩中確實有某些特點符合蘇軾的接受心理，在第三章時，我們已歸結出蘇軾的三種接受心理，更析論出四個文學主張，凡是符合蘇軾接受心理的特點，都是其稱許的對象。而杜甫之所以在蘇軾心中有如此崇高地位，正在於杜甫及其詩作符合了蘇軾的三種接受心理。大體而言，杜詩的廣博多元，符合了蘇軾「對集大成者的肯定心理」；杜甫的憂國憂民，則符合了蘇軾「對有志之士的崇敬心理」；而杜詩的有味外之味，也符合了蘇軾「對澹泊、自然的喜好心理」。由於杜甫及其詩作符合了蘇軾的三種接受心理，蘇軾對其評價自然相當地高，以下分述之。

一、杜詩的廣博多元與蘇軾對集大成者的肯定心理

蘇軾對杜詩的接受，有極大部分來自杜詩的廣博多元特色。杜詩的佳處，正在其樣貌多樣，內容豐實，儼然有集大成之勢。不僅是內容的多樣，詩律方面也是各體兼備，而這這正符合了蘇軾重學力的文學主張，且勾起了蘇軾對集大成者的肯定心理。蘇軾在其文集中，即屢對杜甫的集大成稱許有加，〈書吳道子畫後〉曰：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

¹⁴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八，頁 2143。

¹⁵ 《詩話總龜》前集卷十九引《百斛明珠》，頁 432。

¹⁶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之〈記子美陋句〉，頁 2104。

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¹⁷

人類的文化乃累積而成，文化中的一切事物，都不是一蹴可幾，而是須經過千百年的創造、演變才能逐漸形成；然而一個人的能力及時間有限，不可能從頭徹尾經驗一個大的文化活動，因此，「學」就成了累積、發揚文化的必經歷程。世間學問、百工技藝，都是一代傳一代，逐漸傳承、新變而累積成的。詩、文、書、畫也是歷經數百代而終有可觀之處，能整理、集合這樣豐碩的文化遺產，對蘇軾而言，是相當難能可貴的，而杜甫正是集詩之大成者。因此，蘇軾對杜甫的學力、詩作的廣博多元，給予極高肯定，更進一步指出杜詩令「古今詩人盡廢」¹⁸，評價之高，難以復加。〈記潘延之評予書〉亦曰：「嘗評魯公書與杜子美詩相似，一出之後，前人皆廢。」¹⁹明白指出杜詩一出，各種風格、題材、技法盡在其中，前人詩作皆可不閱而若廢也。

杜詩風貌之多樣，可從前已舉過之〈書子美黃四娘詩〉證知，蘇軾評杜詩「此詩雖不甚佳，可以見子美清狂野逸之態，故僕喜書之。」可見杜詩不僅只有一般人所認識社會寫實類風格，還有展現杜甫「清狂野逸」之貌的詩風。除此之外，杜詩更有其他風貌，蘇軾〈書子美屏跡詩〉曰：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山影漾江流。廢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子瞻云：「此東坡居士之詩也。」或者曰：「此杜子美〈屏跡〉詩也，居士安得竊之？」居士曰：「夫禾麻穀麥，起於神農、后稷，今家有倉廩，不予而取輒為盜，被盜者為失主。若必從其初，則農、稷之物也。今考其詩，字字皆居士實錄，是則居士詩也，子美安得禁吾有哉！」²⁰

蘇軾引了一段杜詩，而跟人說是自己的詩，他人聽到後以為蘇軾偷竊杜詩，蘇軾則回答說，五穀的耕作是神農氏、后稷所發現、發明，而今之農人雖也栽植五穀，但因為是平時生活所行之事，所以不能稱之為偷竊；蘇軾生活與杜詩所描述一模一樣，因此說杜詩是蘇軾之詩也無不可。由此可知，杜甫此詩所描寫與蘇軾當時生活相當契合，而蘇軾在貶黃州後，生活是悠然自得的，觀杜甫此詩，所表現也是不同於憂國憂民的清幽閒散風情，寫的是「漁舟箇箇輕」、「心跡喜雙清」的清閒情懷，面對的是「竹光團野色，山影漾江流」的自然風光，過的是「廢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的懶散生活。詩風一改慷慨激昂的

¹⁷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七十，頁 2210。

¹⁸ 〈書黃子思詩集後一首〉曰：「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節自《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頁 2124。

¹⁹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九，頁 2189。

²⁰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頁 2103。

壯闊之情，也非令人怵目驚心的悲痛之語，而是一派平淡清閒的景色，由此可見杜詩之多元。元稹〈敘詩寄樂天書〉即說：「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²¹說明杜詩的樣貌不僅多元，而且每一體都寫得很好。

除了詩作風格的多元，杜甫各體詩的創作也都有其獨到處。明人胡應麟在其《詩藪》中即對杜甫的各體兼備做過間接且直接的描述：《內編》卷一〈古體上雜言〉即說：

四言之贍，極於韋、孟；五言之贍，極於焦仲卿；雜言之贍，極於木蘭；歌行之贍，極於疇昔帝京；排律之贍，極於岳州夔府諸篇。雖境有神妙，體有古今，然皆敘事工絕。詩中之史，後人但知老杜，何哉？²²

文中胡氏感嘆後人只知道老杜，卻不知古體詩中的四、五、雜言，以及歌行、排律等各體都有其達到極致的相應作品。從這裡一來說明各體的極致或許各有其代表作品，但從「後人但知老杜，何哉」的問句中，也間接透露出杜甫的兼備各體是「後人」所公認的，否則何以後人會「但知老杜」，而使胡氏有此疑問？此外，《內編》卷二〈古體中五言〉說：「少陵不效四言，不做離騷，不用樂府舊題，是此老胸中壁立處。然風騷、樂府遺意，杜往往深得之。」²³說明杜甫雖不仿效四言、離騷、樂府，卻深得風騷、樂府的遺意，又說：「古詩杜少陵後，漢、魏遺響絕矣。至獻吉而始闢其源。」²⁴顯示杜甫之擅長五言古體。其《內編》卷三〈古體下七言〉說：

初唐七言古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概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靈異，遂為大家。²⁵

由胡氏所言，杜甫的七言古體，和李白一樣，都是寫作大家，又可知杜甫之擅長七古。而其《內編》卷四〈近體上五言〉說：「杜五言律，規模正大，格致深沈，而體勢飛動。」又說：「杜五言律，自開元獨步至今。」²⁶可知杜甫五言律詩寫得相當好，所謂規模正大、格致深沈、體勢飛動，以致胡氏稱其從唐開元以來獨步到明朝，無人及之。又說：

排律：沈宋二氏，藻贍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然皆不過十韻，且

²¹ 元稹著，冀勤點校：《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一版）上冊，卷三十，頁352。

²² 《詩藪·內編》，卷一，頁3。

²³ 《詩藪·內編》，卷二，頁36。

²⁴ 《詩藪·內編》，卷二之〈古體中五言〉，頁38。

²⁵ 《詩藪·內編》，卷三，頁52。

²⁶ 《詩藪·內編》，卷四，頁71。

體在繩墨之中，調非畦逕之外。惟杜陵大篇巨什，雄偉神奇。²⁷

胡氏認為唐五言排律，沈佺期、宋之問辭藻華麗、精美而工；李白、王維「明秀高爽」，但都比不上杜甫「大篇巨什，雄偉神奇」，極稱讚杜甫五言排律，難怪又說：「盛唐排律，杜外，右丞為冠，太白次之。」²⁸儼然將杜甫五言排律至於諸人之上。由此可知杜甫之擅長五言排律。至於杜甫七言律詩，胡氏說：「七言律唐以老杜為主。」²⁹又說：

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至崔顥、李白時出古意，一變也。高、岑、王、李，風格大備，又一變也。杜陵雄深浩蕩，超忽縱橫，又一變也。³⁰

杜甫的七言律「雄深浩蕩，超忽縱橫」，雖不能說獨步群雄，也能獨當一面，可知杜甫亦擅長七言律詩。由以上所舉例，雖胡氏一家之說不能代表真相，對杜甫與其他詩人的優劣評斷，有時或許太過武斷，但大體來說，杜甫之兼善各體之說是可以成立的。就是在此一兼善各體，集古今之大成的成就下，蘇軾給予杜甫極高的推崇與肯定。

總之，蘇軾本著對集大成者的肯定心理，對杜詩的廣博多元給予極高評價。當然，蘇軾將杜詩置於眾多詩人之上，絕不是僅因杜詩的廣博多元，符合了蘇軾對集大成者的肯定心理，以及重學的文學主張；杜甫之有一顆憂國憂民之心，而符合了蘇軾對有志之士的崇敬心理，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以下試論之。

二、杜甫的憂國愛民與蘇軾對有志之士的崇敬心理

杜甫之所以被稱為詩聖、詩史，正由於其生處唐代亂世而用生命之詩記錄了那段淒慘歷史。杜詩中的寫實風格，已是不爭事實，而被譽為社會派詩人代表也是當之無愧。蘇軾少有當世之志，在屢遭困頓的生涯中，對杜甫的不得志卻依舊心存天下，自然有一股敬重相惜之感。

蘇軾在屢遭讒言而貶謫流離的日子裡，想起杜甫的遭遇，雖沒有受朝廷重用，仍日夜以天下百姓為重，用詩歌為百姓發聲，這對從小就被灌輸儒家濟世觀念的蘇軾而言，無疑是一帖強心劑。同樣是不得志，都只能以詩文來為百姓說話，有時蘇軾甚至連話都說不得，屢遭詩禍的蘇軾，自是比杜甫多了一層顧忌。在此顧彼自憐的情況下，蘇軾對杜甫又是欽羨，又是敬仰，對杜甫的接受，自然也高

²⁷ 《詩藪·內編》，卷四〈近體上五言〉，頁 58。

²⁸ 《詩藪·內編》，卷四之〈近體上五言〉，頁 74。

²⁹ 《詩藪·內編》，卷五之〈近體中七言〉，頁 80。

³⁰ 《詩藪·內編》，卷五之〈近體中七言〉，頁 81。

了許多。蘇軾詩文中，就常讚揚杜甫憂國憂民之言，〈王定國詩集敘一首〉曰：

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³¹

蘇軾列杜甫為古今詩人之首，原因就在於即使杜甫自己窮困潦倒，且終身不為國家所重用，卻仍能以其愛人濟世之心，時時憂心國事。杜甫〈春望〉³²一詩即歷來膾炙人口的悲國之詩，詩中描述國家經安史亂後，一片慘不忍睹的景象，杜甫透過對比的手法，更烘托出其對安史戰事的痛恨，隱約中亦流露出對天下生民遭此橫禍的不忍情懷。此外杜詩中亦多有對當時人物的評論，蘇軾〈書子美憶昔詩〉曰：

〈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綱紀」，為李國輔也；「張后不樂上為忙」，為肅宗張皇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³³

說明杜詩中多指陳時事，如批評李國輔的敗壞朝廷綱紀，張皇后與肅宗的荒亂妨政，讚揚郭子儀的清肅亂黨，拯救朝廷。杜詩中代言了老百姓不堪國難的悲心，且進一步反省亂象根源，直指亂事禍首，有欲正朝政之心。蘇軾〈雜書子美詩〉³⁴中亦多此類描寫，杜甫這些憂國憂民的詩作正符合了蘇軾對有志之士的崇敬心理，在心有感焉的同感下，對杜甫的詩心及詩力，自然起了共鳴式的崇敬。

除了上述論及因與杜甫的憂國愛民之心產生共鳴而對杜詩有崇敬之心外，蘇軾對杜詩的推崇，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因素。我們知道，宋朝以文立國，早在太祖、太宗二朝已對文士極其禮遇，這導致如田錫等文人皆欲以文學報效君王。隨著崇文日盛，加上古文運動重道思想的茁壯，一種有為於世，謀得一官半職以報效國家的心理早已深植文士心中。就連久厭仕宦的蜀地居民也多漸漸入朝為官，蘇軾正是在此時代氛圍中進京赴試的，其心中正欲一展長才以有為於當世，自然也以仕宦而經世濟民為目標。可是事實並非如此，在蘇軾踏入世途那刻起，就已注定了他顛沛流離的一生。源於朝廷對蜀人反抗因子的陰影而難以真正予以信任，加上蘇軾自身直言不諱的個性得罪不少政敵，再因回蜀守父母喪而難盡早在朝中鞏固自我政治勢力，種種因素，使得蘇軾在官場上屢遭困頓，甚至最後輾轉流離南荒，所期望與所經歷恰恰背道而馳。在這樣大的落差下，如何去調適自我，正是蘇軾所極力想去，也必須去解決的問題。除了從道、佛思想中尋求援助，對自身根深柢固的儒家思想的轉換，也是一個重要的調適環節，而對杜甫的推崇，正可

³¹ 《蘇軾文集》第一冊，卷十，頁 318。

³² 詩云：「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節自《杜詩詳注》第一冊，卷四，頁 320。

³³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頁 2105。

³⁴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頁 2105。

看出蘇軾對儒家思想轉換的端倪。

蘇軾對杜甫的高度認同，或許正是想藉此轉換其儒家思想的內涵，用以肯定自我的生命價值。如果說，仕宦而有所作為是一般文士用以肯定自我、達成自我價值的途徑，那屢遭貶謫的蘇軾則面臨著這自我價值肯定的問題。當其一生期許的仕宦而有為於天下之途被阻斷時，如何去另尋他途而不至於自暴自棄正是蘇軾所當極力想追尋的？顯然地，蘇軾找到的方法就是轉換想法。既然不能仕宦而有為於世，那就當一個關心百姓、替百姓發聲的人。換成現況來說，就是當不了執政黨，也可以當個在野黨，當個慈善家，當個社會批評家，用不同的形式為天下百姓做事，杜甫是這一類人，蘇軾也是想往這方向努力的人。然而對於一直以仕宦有為於天下的士人來說，要將這一想法轉變是需要找到一個理由，或一個楷模來推崇、依循的。在不得不改變仕宦而有為於天下的想法的情況下，蘇軾找到了杜甫，來作為其儒家思想轉換的依據。

蘇軾推出杜甫，予以高度評價，或許正是欲藉由推出杜甫這種官場失意，卻仍有憂國憂民、熱切時事之心的士人，來取代仕宦而有為於天下的傳統想法。從其〈王定國詩集敘一首〉³⁵與〈自題金山畫像〉³⁶可知，蘇軾一方面認為杜甫之所以為古今詩人之首，乃在於他雖流落饑寒，終身不用，卻仍能憂國憂民，一飯未嘗忘君；一方面也說出其遭貶黃州、惠州、儋州的時期，是其一生功業所在。雖然這或許是對自我的一種嘲諷，但隱約中也可能是想轉個方向來肯定自我生命價值，不因生命中屢遭困挫而心灰意冷，反而肯定自我在困挫中的成就。困挫對蘇軾而言不再是一種失敗，而是一種生命再造的契機，藉由詩歌的豐碩創作，對天下百姓的依舊關懷，以及儒家思想的轉換提升，蘇軾將其最困挫的時刻，扭轉為生命價值最極度發揮的時刻，因此將貶黃、惠、儋視為其人生價值之所在，也極力推崇杜甫的困頓而不忘天下百姓。這一切，在在顯示出蘇軾欲將原本以仕宦為主的人生方向，轉換成以憂國憂民的心繫天下精神。這是儒家思想內涵的轉變，一種由兼善天下到獨善其身的轉變，這時兼善天下的情懷還在，只是時不我與，欲濟無力，道、佛思想的介入，以及現實環境的逼迫，使蘇軾不得不對其兼善天下的儒家思想有所修正。然而從小的根深柢固，儒家思想不可能就這樣被放棄，而一下成為道、佛關注自我問題的思想。儒家的獨善其身，和道、佛不同處，就在於儒家思想的積極入世，儒者的獨善，乃在於時不我與，如果時機一旦成熟，復出為天下百姓做事還是其最先宏願。因此儒家的獨善其身，是暫時性的修身養性，是蓄勢待發的韜光養晦，只待時機來不來臨，所以在韜光養晦時，其心還是心繫天下的。儒家思想最終目的是愛民，不是當官，當官只是最有力的手段之一，不是目的之所在。因此兼善天下是目的，獨善其身是等待最有力手段來臨的狀

³⁵ 〈王定國詩集敘一首〉曰：「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節自《蘇軾文集》第一冊，卷十，頁318。

³⁶ 〈自題金山畫像〉云：「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節自《蘇軾詩集》第八冊，卷四十八，頁2641。

態，最有力手段不來，仍能用別的方法兼善天下，如詩歌創作以激發人心，教學開導以轉化民情，都是次於仕宦的方法、手段之一，杜甫是前者，孔子是後者，都是獨善其身而以另一種方式想兼善天下者。蘇軾不是教育家，是個文士，因此走杜甫這條路是較可行的。一方面也是有推舉後進，一方面則大力推崇杜甫，用以對其轉換儒家思想內涵樹立一典範，肯定其生命歷程行進的方向。

總之，蘇軾因自我的不得志，對有志之士本有一種崇敬心理。加上欲解決自我生命價值的所在問題，極需找尋一個能夠肯定自我困頓生活意義的依據。杜甫在這兩方面，正是符合蘇軾需求的最佳人選。因此，蘇軾藉由對杜甫的極力推崇，為自己轉換的儒家思想內涵找到依從對象，也從中肯定了自我屢遭困挫而依舊憂國憂民的生命歷程。蘇軾對杜甫的接受，或許可說是在想要保護自己、肯定自己的心理狀態下（保護自己不因困挫而自怨自嘆、心灰意冷；肯定自己能從另一方向建功立業、愛護百姓），做出的一種心理防衛機制，這心理一直要到蘇軾真正領悟至理，轉向喜愛陶、柳時，才慢慢消滅。

三、杜詩的味外之味與蘇軾對澹泊自然的喜好心理

蘇軾對杜甫及其詩的接受，多半來自前兩個接受心理的驅使，然而在杜詩有味外之味方面，蘇軾也有注意。味外之味是平淡的必備條件，前已說過，若平淡而無味外之味，那種平淡是枯燥乏味的，因此，「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的平淡而有味外味才是上乘的作品。至於什麼是味外味，什麼是平淡，前已舉陶淵明詩作過探討，那是一種「辭達語工」的境界，也就是用自然平實的語言，清楚地描繪出心中所想表達的事理或意境，使人如在目前，如臨其境。窮而後工，說明正是在親身經歷後，才能完整、生動地描述所遇之事物，正如蘇軾〈書子美雲安詩〉所言：「『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此老杜〈雲安縣〉詩也，非親到其處，不知此詩之工。」³⁷杜詩之工，在令人如臨其境，因此聞詩之後，若能更往詩所寫之處，則能知詩所描繪之工。而味外之味，正是在說詩之工者的內涵，即「工」的表現究竟為何。

一般而言，一首詩內涵的呈現，並非都是顯而易見的。有些是透過一個或多個意象的結合，來構成一完整的意境，藉以烘托出作者所欲表達的心情或哲理。當中或許經過好幾層的意象轉換或結合，也或許僅是直言其事，有的淺切，有的深晦，詩的高下就從此顯現出來。太隱晦難解之詩固然會因難以閱讀而降低其價值，然而過於淺顯平鋪的詩也往往流於平易而缺乏深度，沒有玩味的價值³⁸，所謂力度不夠，正是指太過淺易。一首詩若在讀完之後，意思就跟著盡了，本身難

³⁷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頁 2102。

³⁸ 關於「玩味」，可參見王明居：《唐代美學·緒論》（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中「唐代美學傳統風味」議題，其中對「玩味」有詳細的說明，頁 6~8。

再有新的意義衍出，無法令人有回味再三的空間，那麼詩的壽命亦即到此，這是不能成爲一個好作品的。相同地，如果一首詩艱澀難解，詩中盡是生澀典故，且所用之事又沒有精確、生動地蘊含所要指涉的意境，純粹只爲掉書袋，這就容易使人眼花撩亂，不知所云，則不但難明味外之味，反而有妨礙之嫌。這樣的作品，也是下乘。因此，所謂的語工，所謂的味外之味，正是在淺切的語言之中，蘊含另一層或多層意義在其中，不一定要用典故，而是讓人在重複欣賞該作品時，能有不同或更深的體會。也就是說，作品在呈現當下意義時，更隱含著一種當下意義外的人生至理或其他意涵。舉例來說，蘇軾就嘗記載一段董傳論詩的話，〈記董傳論詩〉曰：

故人董傳善論詩，予嘗云：杜子美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傳笑曰：此句殆為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為獨苦，啟獨畫哉！³⁹

這裡引了杜甫「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詩句，兩人相與討論，我們可以參考蘇軾另一篇文章一起探討，〈書林道人論琴碁〉曰：

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之知者，此其所以唯獨苦歟！⁴⁰

從這兩則文中，可以知道杜甫在論畫時，談到的「獨苦」並非僅指畫家而言，雖表面意涵所指爲畫家之獨苦，其實仔細斟酌就會發現，正如董傳所說的，這獨苦的地方是在於作者用意深的地方，往往很難令人識得，因此作品精微處通常都只有作者自己知曉，不但畫家如此，文人、詩人，甚至哲學家、聖人都是如此，正如蘇軾所言「有舉世莫之知者」，所以只能「獨苦」。從此可知，「獨苦」一語看似平實，然而再三玩味之，卻有如此意涵，故蘇軾言其「用意之妙」，這也是「語工」的表現。如前所言，「非親到其處，不知此詩之工」，沒有杜甫的體驗，不知杜詩用意之妙。由此亦可知，杜詩之有味外之味、用意之妙。

總之，杜詩用意之妙、有味外之味，正好符合了蘇軾對澹泊、自然的喜好心理，因此對杜詩更增添了一分喜好之情。杜詩的廣博多元，是蘇軾肯定的對象；杜甫的憂國憂民之心，是蘇軾崇敬的特質；再加上杜詩的用意之妙、有味外之味，增添了蘇軾的喜好心理，在三種接受心理皆得到滿足的情況下，杜甫及其詩作在蘇軾心中便有了極高的地位。然而，隨著時日的推移，蘇軾三種接受心理的消長互易，經過貶謫生活的歷練，以及儒道佛思想的深化、融合，蘇軾對杜甫及其詩作的推崇漸漸不如陶淵明。由此可知，蘇軾對杜甫的推崇，亦即對杜甫的接受程

³⁹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八，頁 2136。

⁴⁰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七十一，頁 2250。

度，實在有其特定觀點的；而這觀點即來自蘇軾本身的審美趣味與接受心理，一旦接受心理在程度上有所改變，其對前人的接受程度也會跟著改變。

第三節 對韓愈的接受內涵

蘇軾對韓愈的稱許，其實不在詩文方面，而在其對儒學傳承上的成就。對於韓愈的詩文與儒學思想，蘇軾其實並非完全認同，而是有褒有貶的。惟韓愈對發揚儒學有莫大貢獻，且生平與蘇軾遭遇相似，因此蘇軾在對韓愈的接受與評價上正面多於負面。

大抵而言，韓愈給人的印象，是在儒家思想的發展與詩文創作的成果上有很大的成就，一般人對韓愈的推崇也多源於此，然而蘇軾對韓愈的接受，卻並非全然如此。蘇軾對於韓愈在儒家思想內涵上的闡述，似乎並不如一般人那樣認同，其〈揚雄論〉曰：

昔日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於一。始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嗟夫！是未知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⁴¹

文中談到諸人對「性」的認識，蘇軾認為從孟子以至於韓愈，都不瞭解「性」與「才」的區別，因此才有性善、性惡或善惡混以及三品說等結論。姑不論蘇軾的觀點是否正確，就蘇軾而言，對韓愈的三品說的不認同則是事實。至於蘇軾何以如此說呢？〈揚雄論〉後又有談到：

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為榦，柔者為輪，大者為楹，小者為桷。桷之不可以為楹，輪之不可以為榦，是豈其性之罪也？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⁴²

蘇軾以為，所謂「性」，當指人所共有之部分，是聖人和小人都同樣擁有的部分。至於其發展會有不同，不在於「性」的不同，而是「才」的不同。這裡的「才」或許可以說是領悟力，也可以說是智慧或其他才力，但絕不是「性」。「性」是天

⁴¹ 《蘇軾文集》第一冊，卷四，頁 110。

⁴² 《蘇軾文集》第一冊，卷四，頁 110。

賦而人人皆有的，就好比植物的生長，是每一個植物都有的性質，這才是植物的「性」，至於長出來的模樣、功用不同，則是「才」的不同所形成的。

這裡蘇軾談到了「性」、「才」、「情」三個名詞，其中「性」和「才」是蘇軾本身用來談論區別「性」的用語，至於「情」則是借用別人的用語，來解釋其心中所認為「性」的用語。這裡先說明一下「情」，一般人所謂「情」，乃是指「性」接觸到外界事物所產生的反應，如喜、怒、哀、樂等情感反應，如荀子〈正名〉曰：「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⁴³韓愈也說：「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⁴⁴都認為「情」是「性」和外界交感所產生的狀態，和「性」是不同的。蘇軾則以為不然，他認為一般人所說的喜、怒、哀、樂等情緒，正是人的本性。〈韓愈論〉曰：

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⁴⁵

蘇軾認為，這些情感都是人生而有之的，是聖人與小人所共有，小人用以抒發感受，聖人用以成就仁義禮樂，因此是人的「性」。一般人分不清楚，將這些「性」說成「情」，荀子如是，韓愈亦如是，所以蘇軾說韓愈是「離性以為情」，將「性」分成喜怒哀樂等而當作「情」，這是不明白「性」的內涵。至於韓愈將人分三品，以為性有上、中、下三等，則是將人所能發展的可能說成「性」，蘇軾認為是說不通的。人之所以成就不一，在於先天才力以及後天環境與努力與否所造成，這些不管是先天的才力或是後天環境與努力，都是人人所不一樣的，也是可以改變的，這當屬於「才」的範圍，而不能說是「性」，所以蘇軾說韓愈「合才以為性」，把各種「才」的影響所造成的結果當作是「性」，是不合邏輯的，這樣的見解是「終莫能通」的。蘇軾〈揚雄論〉後更說：

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天理，與眾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為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⁴⁶

再次強調韓愈的「離性以為情」，將人的情感與本性分離，視為二物，而欲將之排除於「性」之外，這與佛、老的滅人欲、去人情相同。韓愈一生排佛去老，卻

⁴³ 李滌生：《荀子集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年，第一版），頁506。

⁴⁴ 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卷一之〈原性〉，頁20。

⁴⁵ 《蘇軾文集》第一冊，卷四，頁113。

⁴⁶ 《蘇軾文集》第一冊，卷四，頁110。

做著與佛、老無異之事，可說是「自叛其說而不自知」⁴⁷，可見蘇軾對韓愈論性之不以為然。姑不論蘇軾見解是否合理，由上述的討論，蘇軾之不認同韓愈的性論思想可得而知。由此可知，蘇軾之推崇韓愈當不在於對韓愈儒家思想內涵的認同，甚至我們可以說，蘇軾認為韓愈是不懂儒家思想內涵的人。

蘇軾認為，韓愈其實是不懂聖人之道的人，他只是好聖人之道的名氣罷了。
〈韓愈論〉曰：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悉力，爭鬥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為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⁴⁸

蘇軾認為，對於聖人之道之追求有兩種情形，一種是聽人說聖人之道好，就趨之若鶩地去讚揚、推崇，而不知聖人之道究竟哪裡好，哪裡值得推崇，就好像一般人認為寶石、珍玩等物相當珍貴，而不知道到底好在哪，珍貴在哪，可以用來做什麼，只是一味盲從；也好像追求品牌，只道人人說很珍貴，而不知其為何如此珍貴，等到流行一過，就對其棄如草芥，不值一哂。這種人，蘇軾認為是好其名者，不是真正懂聖人之道者。另一種則是真正瞭解到聖人之道的好，對其內涵有所讚賞，實行後覺得能夠心安理得，而後發出內心地去推崇、讚賞，這是「安其實而樂之者」，是真正懂聖人之道者，就好像人吃了美食，穿了美衣一樣，能深切地感受到它的好而喜愛之。而蘇軾認為韓愈，不是一個真知道聖人之道的人，韓愈之推崇聖人之道，只是好其名罷了。

何以蘇軾這麼認為？蘇軾有作說明，他說：

（韓愈）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揚、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⁴⁹

就蘇軾所言，他覺得韓愈不知聖人之道之真正內涵，往往說法與聖人之道不同，掛羊頭賣狗肉，前所舉「論性」一事即可說明，蘇軾認為韓愈一心排佛拒老，結果其說法與佛、老無異，可謂自叛其說甚矣。即使他如何推崇孔、孟，如何排斥佛、老、揚、墨，在自叛其說的情況下，也只能說他只是好聖人之名，未能安其

⁴⁷ 《蘇軾文集》第一冊，卷四之〈韓愈論〉，頁 113。

⁴⁸ 《蘇軾文集》第一冊，卷四，頁 113。

⁴⁹ 《蘇軾文集》第一冊，卷四之〈韓愈論〉，頁 113。

實而樂之。蘇軾更舉韓愈〈原人〉一文批評韓愈的理論不合聖人之道，〈韓愈論〉曰：

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⁵⁰

文中批評韓愈混淆了儒家的仁愛和墨家的兼愛之說。儒、墨之不同，在於「別」一字，而韓愈不知也。墨家之愛，無所分別，故天下之父皆為我父，天下之子皆為我子，一視而同仁，這樣的說法孟子已做過批評，認為人力有不足，而所對之萬物無窮，如果要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公平待之，那最後的結果就是通通不給，因為給其中一人就對其他人不公平，要給全部又力有未逮，這不是真正的聖人所該主張的。因此，儒家之仁愛，是主張有所「分別」的。儒家主張親疏有別，先能愛自己，再愛別人；先能愛家人，再愛族人；先能愛族人，再愛國人；先能愛國人，再愛天下人；當天下人都愛了，更推及草木禽獸，以至於一切事物、環境。所愛也有輕重，愛家人多族人一點，愛族人多國人一點，愛國人多天下人一點，愛人又多愛禽獸一點，這是順著人情而發展出來的推恩理念，一來顧及人情，二來也遍及他人，蘇軾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儒家聖人之道。韓愈不明白這個道理，只是一味推崇孔、孟，而所言卻是墨家的兼愛思想，正是徒好聖人之名之徒耳。由以上的論述，實可知蘇軾之推崇韓愈，絕不是因為對韓愈的儒家思想內涵有所認同，那究竟蘇軾是對韓愈的哪一點感到認同呢？

蘇軾對韓愈的接受，可從兩個方面來探討：一個是韓愈本身的成就，一個則是蘇軾自身的問題。首先探討韓愈本身的成就：前已討論過，韓愈的儒家思想內涵在蘇軾看來是有問題的，那何以蘇軾對韓愈仍是推崇有加？原因全在於韓愈的復興儒學。魏、晉以來，佛、老並起，儒學風光不再，文風偏向綺靡敗壞，至唐以後，五代卑弱餘風難以淨除，可謂「道喪文弊」之極。韓愈於此時高舉儒學，隱有振興儒學之實，蘇軾對韓愈的接受，即是從這個角度入手的。〈潮州韓文公廟碑〉曰：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

⁵⁰ 《蘇軾文集》第一冊，卷四，頁113。

勇奪三軍之師。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⁵¹

蘇軾看到了韓愈復興儒學這一點，對整個社會風氣及文壇風格都有很大影響。基於此，蘇軾特別推崇韓愈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偉舉，給予崇高地位，儼然有孔子評管仲的眼界，不因其小節而壞其大仁。其〈六一居士集序〉也說：

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子，蓋庶幾焉。⁵²

更言韓愈乃上承孟子，以救天下之溺者，肯定之情，溢於言表。蘇軾在其對有志之士的崇敬心理引導下，對韓愈的振興儒學，真的是起了共鳴式的推崇。蘇軾一心想救世濟民，為國家盡心盡力，可惜時不我與，對於韓愈這等能有功於社稷家國之人，有那麼大顯著成就之人，其心中的敬佩與嚮往是相當深切的。

當然，蘇軾對韓愈的推崇，不僅是因韓愈在復興儒學上的成就，還有其他蘇軾自身的因素：第一是，蘇軾認為韓愈的遭遇與自己相似。韓愈一生，亦多遭人謗陷，不被帝王重用，蘇軾對此心生感慨，〈潮州韓文公廟碑〉即曰：

故公（韓愈）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於朝廷之上。⁵³

感慨韓愈雖有開山馴鱷之能，卻不能自免於朝廷之中，屢遭毀謗而不得信於憲宗。蘇軾看到韓愈的遭遇，就想到自己，自己何嘗不是屢遭小人謗毀，而一生流離失所，在這方面，蘇軾和韓愈是相似的。其〈書退之詩〉曰：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得磨蝎為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⁵⁴

又《東坡志林》卷八曰：「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⁵⁵蘇軾自言生時多遭謗譽的命和韓愈是一樣的，這裡僅言多遭逢謗譽，其實並不是因遭謗譽而自比韓愈，那是沒有意義的。如果只是為了說遭逢謗譽一事，那有何了不起，何必提出這點然後說自己和韓愈一樣，蘇軾這麼說自然有其深意。一來是蘇

⁵¹ 《蘇軾文集》第二冊，卷十七，頁 508。

⁵² 《蘇軾文集》第一冊，卷十，頁 315、316。

⁵³ 《蘇軾文集》第二冊，卷十七，頁 508。

⁵⁴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頁 2122。

⁵⁵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3 冊，子部一六九雜家類，頁 74。

軾確實肯定韓愈在儒家思想傳承上有很大的建樹，對文風的振興亦有莫大貢獻，因此若自己能和韓愈劃上相似之處，則自我生命價值至少也能獲得自我的肯定。基於此，蘇軾提出自我多遭謗譽與韓愈相似，以為肯定自我。當然，這裡的多遭謗譽是有其背後意涵的。遭謗譽並不是單純的遭人毀謗，而是有雄心壯志於天下，欲有一番作為，無奈得罪小人，才遭小人毀謗。這裡要強調的，並不是遭謗譽一事，而是其背後所隱含的有為於天下而不怕遭謗之意。表面上蘇軾言自己多遭謗譽與韓愈同，實際上蘇軾所想要表達的是自己亦有韓愈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雄心壯志，甚至還想在政壇上能多有建樹，以立下實質之功，因此，才會自比韓愈。而蘇軾一生有志難伸，也藉由與韓愈相比，如韓愈之大才，猶且「不能回憲宗之惑」，自己的屢遭小人謗毀，也當屬平常之事，用以自遣，更肯定自我的生命價值。

在這一層欲自我肯定的因素作用下，蘇軾對韓愈的推崇心理自是提高了一級。除此之外，歐陽脩對蘇軾的影響，亦不容小覷。我們知道，歐陽脩對韓愈的推崇，古今無人能出其右，歐陽脩一生論韓愈之文甚多，且多所稱譽，其〈讀徂徠集〉曰：「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⁵⁶說石介所關心者，惟孔、孟與揚、韓，自己也是如此。〈菱溪大石〉曰：「盧仝、韓愈不在世，彈壓百怪無雄文。」⁵⁷稱許韓愈之文之雄偉。〈蘇氏文集序〉則提到韓愈恢復古文的功績⁵⁸，〈記舊本韓文後〉⁵⁹更是對韓愈的文章大加稱揚，「其言深厚而雄博」，「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筆力無施不可」，對韓愈之文可說極為讚嘆。歐陽脩一生以古文運動為己任，對蘇家三人及曾鞏、王安石等的提拔，都是為古文盡心盡力，而其古文上承韓愈之志，對韓愈的推崇可想而知。就是這一因素，蘇軾身為歐陽脩得意門生，儼然是古文運動繼歐陽脩後的接班人，其對歐陽脩的敬仰，自如同歐陽脩對韓愈的敬仰一般。在此前提之下，蘇軾對韓愈的接受，自是多了一層尊師情懷。此外，為了對歐陽脩的努力與貢獻加以認同、讚揚，蘇軾找出了一條儒家道統的銜接之路，這條路上溯至孔、孟，中經韓愈，下達歐陽脩，這是一條古文復興之路，也是一條儒學道統之路。⁶⁰為了稱揚歐陽脩在這上面的成就，自然必須對韓愈有所認同，因為歐陽脩正是承繼韓愈而來。也因此，蘇軾對韓愈的接受上，又多了一股正向的力量。種種因素，使得蘇軾對韓愈是褒多餘貶，推崇多餘詆毀的。

⁵⁶ 《歐陽脩全集》第一冊，卷三，頁 43。

⁵⁷ 《歐陽脩全集》第一冊，卷三，頁 51。

⁵⁸ 〈蘇氏文集序〉曰：「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愈）、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節自《歐陽脩全集》第二冊，卷四十三，頁 613、614。

⁵⁹ 《歐陽脩全集》第三冊，卷七十三，頁 1056、1057。

⁶⁰ 〈六一居士集序〉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節自《蘇軾文集》第一冊，卷十，頁 316。

從蘇軾對韓愈詩歌的接受態度上，亦可從另一角度證明這一點。蘇軾對韓詩其實是有所微言的，原因在於韓詩的奇險怪異，這不符合蘇軾的接受心理。然而由於上述所言蘇軾因對有志之士的崇敬心理，與欲藉韓愈來肯定自我生命價值，以及歐陽脩的影響，蘇軾對韓詩雖不喜愛，批評時卻是有所保留的。但從蘇軾含蓄的評論中，仍可看出蘇軾其實不喜韓詩，（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十七之〈韓吏部中〉即引蘇軾評韓愈詩曰：

東坡云：「書之美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魯公始；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⁶¹

從這一則記載，可知蘇軾用心。首先，以顏真卿與韓愈對舉，顏真卿乃書法界有目共睹的大家，地位之崇高，一時難出其右，將韓詩與之並舉，實先肯定韓詩在詩壇上的地位。接下來，續言其美，進一步說明韓詩在世人眼中是相當美的，這是再一次地推崇；經過兩次的推崇，而用一「然」字，略作微詞，說出其心中真正感覺，但在批評之前，先言魯公之壞書法，再說韓愈之變詩格，又是將批評的話說得委婉之極。試想以魯公之能，受人之肯定，猶且壞書之法，韓愈之有缺失，也是情有可原。然而亦不明言韓詩之壞詩格，而用「變」字替換，都是極替韓愈辯護的寫法。其實從這兩句的對舉，即可知蘇軾對韓詩的批評，正如對顏魯公書法的批評一樣，是先褒後貶的，這是一般委婉批評的作法，先說好的，再談缺失，讓人先有被肯定感，然後聽得下其後建言，而評論者真正的重點，本是放在後面的批評，前面的稱許，只是為卸下受評者的防衛心理。蘇軾此處自然不是怕韓愈聽不下他的話，畢竟韓愈也無從反駁或表示認同，而蘇軾之所以用這手法，一來本於文人的寬厚、委婉性格，批評留三分地；二來韓愈的振興儒學與提倡古文的成就亦引起蘇軾對有志之士的崇敬心理；再加上蘇軾自身因素與歐陽脩的影響，以及要讓自己的評論更為崇韓者所接受，因此對韓詩的評論，儘管不慎喜愛，也盡量不加以批評。

然而何以說蘇軾之不喜韓詩呢？難道蘇軾不是真正喜愛韓詩才有這樣的評論，才對韓詩沒有什麼微言？其實從蘇軾評論韓、柳詩的說法，則可見蘇軾不喜韓詩之端倪。〈評韓柳詩〉曰：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

⁶¹（宋）胡仔撰，楊家駱主編：《苕溪漁隱叢話》（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第一版）前集，卷十七，頁109。

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⁶²

在這裡蘇軾將陶淵明、柳宗元、韓愈、韋應物作了一些比較，也說出了自己喜歡的詩作風格究竟為何。蘇軾指出，韓愈的詩風，在於「豪放奇險」，而柳宗元一類詩則「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從這裡的評論，可知蘇軾較喜歡的是陶淵明、柳宗元一類作品，也就是「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一類風格的作品，也肯定這類作品的價值，是「百無一二」的。既然蘇軾喜歡的是這一類的詩作，那對於韓愈那種「豪放奇險」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的作品，自然是較不欣賞的。再看蘇軾〈題柳子厚詩二首〉其二曰：

詩須要有為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⁶³

文中談到，詩之病在「好奇務新」，蘇軾之不喜奇險之風可知矣，因此對韓詩的「豪放奇險」評語，實是委婉的批評。這又再次說明了，蘇軾之推崇韓愈者，當不在韓愈的儒家思想內涵，也不在韓詩之美，而是在韓愈復興儒道，提倡古文方面上。

總之，蘇軾對韓愈的接受，主要是從其在復興儒學與推動古文路上的成就切入，而對韓愈儒家思想內涵的闡述，以及韓詩的奇險風格是略有微言的。然由於韓愈在復興古文道上的成就非凡，加上蘇軾有意藉韓愈來肯定自我生命價值，以及在歐陽修推崇韓愈的影響之下，蘇軾對韓愈的評價與接受程度仍舊是相當高的。

第四節 對柳宗元的接受內涵

不同於對韓愈的接受，蘇軾對柳宗元的接受，全在於其詩歌。如果說蘇軾對韓愈的推崇，是由對韓愈復興儒學與推動古文運動的推崇帶動對韓詩的接受，那對柳宗元的接受，則是對其詩的愛好帶動其他方面的接受。歷來對柳宗元的評價，除了柳詩以外，落差極大，無論是對其哲學思想或是政治立場都有兩極化的接受取向⁶⁴。蘇軾對柳宗元這些方面的接受，也是有褒有貶。哲學思想方面，蘇軾是有較多微言的。柳宗元曾作〈非國語〉，郎瑛讚其「以正理而矯淫誣之辭」⁶⁵，蘇軾則不以爲然，其〈與江惇禮五首〉其二曰：

⁶²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頁 2109。

⁶³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頁 2109。

⁶⁴ 吳文治編：《柳宗元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一版）上冊之〈前言〉，頁 2～4。

⁶⁵ 《柳宗元資料彙編》上冊之〈前言〉，頁 2。

向示〈非國語〉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為書爾。所示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爾。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⁶⁶

文中對柳宗元的〈非國語〉直接予以批評，認為柳宗元的哲學思想多是「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知」類的想法，這是不符合儒家正宗思想的。儒者之設禮樂、敬鬼神而遠之，自有其教民、化民的功用，如果以禮樂為虛器，以天人為不相知，則民難教化，正所謂小人無忌憚而難教化也。

蘇軾之〈屈到嗜芰論〉也表現出對柳宗元思想的不認同，文中談到，屈到喜歡吃芰，芰就是四角的菱角。他病危時，命族人要用菱角來祭拜他，等祭拜的日子到了，族人想依其言用菱角祭拜他，他兒子屈建卻命人把菱角拿掉，君子皆稱其「不違而道」。柳宗元卻說：「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為道。」柳宗元認為，屈到之子因為守小禮而沒有遵守他父親病危之言，是不孝順的表現，而且《禮》中也有說，祭祀的時候，應該懷念往者的愛好之事物，屈到之子用菱角來祭拜，應該是不違禮的，但屈到之子卻違背其父親之意而拿掉菱角，這算是為道嗎？可見柳宗元對這件事非常不滿意。但蘇軾的看法則不然，蘇軾認為，「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說話是要看對象、看場合的，平常父子說話，因為是至親，可以暢所欲言，表達自己心中慾念，即使是醜事，也無須隱晦。可是家醜不可外揚，今天屈到乃楚之正卿，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眾人注目，且其在世時聲聞良好，今天臨死之時，身為正卿，所思應該是家國人民之事，不該是個人口腹之慾。如果今天屈建（屈到之子）用菱角來祭拜他，則其臨危只關心自己口腹之慾一事勢必流傳開來，這對其死後名聲將有重大影響。因此蘇軾認為屈建做得相當對，柳宗元的因小恩而忘大義，蘇軾反而是不以為然。

67

政治立場方面，蘇軾對柳宗元則是持肯定態度的。柳宗元在政事上，最為人所詬病的，就是王叔文事件。據《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之〈柳宗元傳〉記載：

順宗即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與監察呂溫密引禁中，與之圖事。轉尚書禮部員外郎，叔文欲大用之。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為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⁶⁸

⁶⁶ 《蘇軾文集》第四冊，卷五十六，頁 1703。

⁶⁷ 《蘇軾文集》第一冊，卷四之〈屈到嗜芰論〉，頁 130、131。

⁶⁸ 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一版），卷一百六十，頁 4213、4214。

《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八之〈柳宗元傳〉亦有類似記載：

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裡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⁶⁹

從《新、舊唐書》記載，可知柳宗元確實參加所謂的王叔文集團。王叔文集團在當時屢遭批評，柳宗元加入此集團，因而也受到不少微言，連其好友韓愈也對他做過一些微言，韓愈〈柳子厚墓誌銘〉即曰：「子厚前時年少，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⁷⁰說柳宗元當時年少不懂事，以為跟著王叔文集團就可以功名立就，誰知事敗，反遭貶永州司馬。然而面對這樣的事，蘇軾卻有不同的看法。

蘇軾對柳宗元的參與王叔文集團，與前述諸人看法不同，他是用較客觀的角度看待這件事，其實宋人看法如歐陽修等多與蘇軾相似，這或許是宋人與王叔文非政壇敵人，因此更能客觀地看待整個事件；再者宋人的思想本較為創新、活潑，許多翻案的文章在宋人文集中是屢見不鮮的。在種種因素下，蘇軾對柳宗元參與王叔文集團，有其自我看法，其〈續歐陽子朋黨論〉曰：

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為唐名臣矣。⁷¹

這裡明顯可以看出蘇軾對柳、劉二人的愛戴之情。不同於以往對柳宗元的看待觀點，蘇軾改由其才能一面入手，蘇軾關注的是柳宗元的才能。以往詬病柳宗元者，多說其不忠，參加了亂黨，因此多是批評之語。然而蘇軾一面推翻這個角度的批評，一面建立一個新的視角來評論柳宗元，他以孔子的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說明真正的仁者，是在可以處仁的時候，能夠安心地行仁而無所倦怠；不能行仁的時候，智者會找時機來行仁，柳宗元做的事正是智者要做的。柳宗元選擇時機來從政而為民做事是進取的，從這一點看來柳宗元的作為不但沒有不對，反而應該鼓勵，只是他選擇的集團錯了罷了。而且柳宗元之加入王叔文集團，也是有原因的，柳宗元跟他們的關係，並不是其主動去建立的，蘇軾〈柳子厚誕妄〉曰：

柳宗元敢為誕妄，居之不疑。呂溫為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過於此者，必呱呱然。雖子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其稱溫之

⁶⁹ 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一版），卷一百六十八，頁5132。

⁷⁰ 《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七，頁513。

⁷¹ 《蘇軾文集》第一冊，卷四，頁128。

弟恭，亦賢豪絕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孰有士君子肯為裴延齡婿者乎？柳宗元與伍、叔文交，蓋亦不差於延齡姻也。⁷²

可見柳宗元和王叔文等的關係，就如同呂溫、呂恭與裴延齡一樣，是姻親關係，是難以避免的關係，當姻親中有人如此賞識他，提拔他時，他欲出來有所作為也屬人之常情，且柳宗元敢為誕妄的個性，本身任性不羈，有時會不顧世俗眼光而與世俗認為不賢之人有所交情。對王叔文事件，或可責其識人不明，交友不慎，然對其政事能力與人格，實不應過份批評，蘇軾認為是可以原諒的。除了辯駁柳宗元參加王叔文集團屬人之常情外，蘇軾更進一步肯定柳宗元的「高才絕學」，認為柳宗元如果參加了對的陣營，當能成為唐之名臣。從蘇軾看中柳宗元的才學，和為柳辯駁王叔文一事看來，蘇軾對柳宗元實存有好感，且有高度的認同。這或許同為政場上的失意者，有相憐之意，也或許蘇軾屢遭謗怨，對遭貶之人有一股深刻的瞭解，看透了是非本無絕對，要從人的本心去看，而不只是觀察到表象。柳宗元的外在行為雖然有缺失，跟錯了人，但不代表他跟那些人一樣，都是想敗壞朝政。柳宗元的心是為民的，是急於想有一番作為的，不應只因他跟錯人而否定他的一切。蘇軾政敵王安石其實也是這方面的人，王安石為國為民的心是值得嘉許的，只是其政見太過激進，且錯用小人，個性又剛愎自用，導致所推行之新政產生一連串問題。但蘇軾也沒有因此而挾怨王安石，其後更與王安石成為好友，原因正在於蘇軾看人不只是看事件表象，而是看人出發點的用意，對王安石如此，對柳宗元也是如此。

在兩極化的評論中，蘇軾對柳宗元做出了較客觀的評價，給了柳宗元一個較公平的平反。蘇軾能為柳宗元較客觀地看待，一來由於上述蘇軾眼界較開闊原因外，二來蘇軾對柳宗元詩歌的喜愛或許也有一些影響。蘇軾對柳宗元的詩歌接受，是在晚年，而且評價相當之高，甚至有「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⁷³的評語，將柳宗元與陶淵明並舉，雖不及陶淵明，卻是最接近的人。我們知道，蘇軾晚年最喜陶淵明，更將其置於李白、杜甫之上，原因是陶詩「外枯中膏」、「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的風格吸引了蘇軾此時期的接受心理。而柳宗元詩的風格，正也是這一類「溫麗靖深」風格，蘇軾對其詩自然也是喜愛有加。

觀前人評柳宗元詩，鮮有人稱許，也鮮有人看到柳宗元平淡這一面詩風。在蘇軾之前，惟劉禹錫說柳詩「顧其詞甚約，而味淵然以長」，又「附離不以鑿柄，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⁷⁴可說真知柳宗元詩風者，點出了柳詩的簡約而有味，似苦而腴，似癯而清。除了劉禹錫，司空圖也

⁷²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五，頁 2037。

⁷³ 語出〈評韓柳詩〉，節自《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頁 2109。

⁷⁴ 語出〈答柳子厚〉，節自劉禹錫著，《劉禹錫集》整理組點校，卞孝萱校訂：《劉禹錫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一版）上冊，卷十，頁 127。

提出了柳詩韻味深遠⁷⁵，這兩人的見解，多少為蘇軾所採納、接受。

觀蘇軾詩文集中論及柳宗元的篇章，可知蘇軾是相當喜愛柳詩的。蘇軾之愛柳詩，應在南遷之後而見明顯。原因在柳詩與陶詩一樣，皆符合蘇軾當時傾向的對澹泊、自然的喜好心理。因此，蘇軾當時對柳詩的喜愛，僅在陶詩之下，其〈與程全父十二首〉之十一即曰：

流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為二友。⁷⁶

蘇軾自言南遷以後，唯有陶淵明和柳宗元詩文集在身邊，且以為二友，常置左右。蘇軾之喜愛柳宗元，也可從其常書柳宗元作品與以柳宗元教人證知。蘇軾常書柳宗元作品，〈書柳子厚牛賦後一首〉⁷⁷即敘述蘇軾南遷海南，見居民有殺牛的迷信習俗，蘇軾感自己無力改其陋俗，因此書柳宗元〈牛賦〉，用以稍改其俗。又元符乙卯十一月十九日，蘇軾忽得龍川信，隨信寄來一些紙，蘇軾即書柳詩來試紙。⁷⁸拿到新紙即用來寫柳詩，如果不是相當喜愛柳詩，當不至此。而其〈題所書東海若後〉也明確指出「軾久欲書柳子厚所作〈東海若〉一篇，刻之石，置之淨住院無量壽佛堂中。」⁷⁹直接說出自己久欲書柳宗元〈東海若〉作品，以放置佛堂之中。除了書寫柳宗元作品，蘇軾也常書柳詩贈人。元符乙卯閏九月，瓊州太守姜君來到儋耳見蘇軾，及其歸時，蘇軾沒什麼禮相贈，於是就寫了柳宗元的〈飲酒〉、〈詩書〉兩首詩送給姜君，以見別意，⁸⁰此外蘇軾更教其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⁸¹。從以上所述蘇軾之喜歡書寫柳宗元作品，又以柳詩贈人，以及教人熟看柳文，可知蘇軾之喜愛柳宗元詩文為無可置疑的事實。那究竟蘇軾何以喜愛柳宗元詩文？又蘇軾喜愛柳宗元哪一點？亦即柳宗元的哪些特點符合了蘇軾當時的接受心理？前已大略述及，以下續論之。

究竟蘇軾何以喜歡柳詩？蘇軾之喜歡柳詩當在南遷之時，其〈書柳子厚牛賦一首〉寫海南之事，〈書柳子厚大鑿禪師碑後〉⁸²自言紹聖三年作，〈與姪孫元老四首〉教其姪孫學韓柳文亦在海南所寫，紹聖三年作〈書柳子厚南澗詩〉⁸³，元符乙卯作〈書柳子厚詩〉與〈書柳子厚詩後〉，蘇軾開始大量評論、書寫柳宗元

⁷⁵ 司空圖〈題柳柳州集後〉曰：「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節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83冊，集部二二別集類之《司空表聖文集》，頁496。

⁷⁶ 《蘇軾文集》第四冊，卷五十五，頁1627。

⁷⁷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六，頁2058。

⁷⁸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之〈書柳子厚詩〉，頁2120。

⁷⁹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九，頁2198。

⁸⁰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之〈書柳子厚詩後〉，頁2120。

⁸¹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之〈與姪孫元老四首〉其二，頁1842。

⁸²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六，頁2084。

⁸³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頁2116。

作品多在南遷之後，可知蘇軾之喜柳和喜陶一樣，當在南遷之後。前已說過，蘇軾經兩次的宦海浮沈，一來對世事徹底了悟，二來所學淵博而歸於平淡，因此這時期的審美趣味已傾向澹泊、自然而有味外之味的詩風。蘇軾這時期的接受心理，是以對澹泊、自然的喜好心理為主的。在此接受心理的主導下，對那種看似平淡而有味外味的作品，自然有特別鍾愛的傾向，對陶、柳的喜愛，正是如此。

那所謂的平淡指的又是什麼？柳詩之符合蘇軾的接受心理，到底是有哪些具體特點？這牽涉到蘇軾喜歡柳詩的哪一點。柳詩特色自然不只一種，而蘇軾喜歡的那點，正是柳宗元能吸引蘇軾的那點。蘇軾對柳詩的喜好，是有一特定標準的，這一標準，正是第三章所談到的「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的平淡詩風，柳詩正符合了蘇軾這時接受心理，而究竟柳詩詩風中哪一特點符合蘇軾接受心理？〈書黃子思詩集後〉說：

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⁸⁴

這裡蘇軾明白指出柳詩的特色正是「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所謂簡古與澹泊，即是給人初看下的印象，因為作品呈現出一種古樸簡約而又平淡自然的風貌，因此初看下令人有簡古、澹泊的感覺；而纖穠和至味則指是作品經過咀嚼後給人的深層感受。整句話就是形容作品表面上看起來，給人一種平實、自然的感覺，但經過仔細的咀嚼，又發覺擁有豐富而深刻的內涵。「纖穠」就是豐富而深刻，在「簡古」的對照下，更顯得其細緻、濃郁；「至味」是一種極致的風味，與澹泊相對下，更能表現出風味的深遠。蘇軾正是認為柳宗元等的詩風表面看起來平實、自然，深究下確有無窮無盡的深刻內涵，因此覺得是詩中佳作，「非餘子所及也」。

至於如何才能做到這樣平實、自然而又富有深刻內涵？第一步得靠學習。要有豐富而深刻的內涵，首先得有廣博精深的學問，這是創作的泉源，而這些都得建立在學習前人知識、經驗的基礎上，這也是為什麼蘇軾一直強調學的重要。唯有透過勤學，才能初步掌握創作泉源，沒有泉源，所寫出來的不過是空洞、虛浮的作品，是無法有纖穠的內涵的。因此蘇軾強調：創作不是沒有依據，不是好奇務新的。〈題柳子厚詩二首〉其二即說：

詩須要有為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⁸⁵

⁸⁴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頁 2124。

⁸⁵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頁 2109。

蘇軾指出，柳詩之佳，在於「有為而作」、「以故為新」、「以俗為雅」，而不是「好奇務新」。這裡的「有為」指的就是心中有所欲言，非為作文而作文，「以故為新」、「以俗為雅」正是強調學習前人的重要。所謂「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就是要建立在過去的、通俗的知識架構上，繼而參入一些自我的、特殊的內涵，融合轉化後成爲一種新奇，卻又不會與舊有知識格格不入的風格。那是一種經過學習、消化前人知識，繼而變化出來的新奇而不怪誕的風貌。這不僅要人有所創新，更強調要吸取前人經驗；若只是爲了表面的新奇而下盡功夫，忘卻了深層的內涵，那最終將淪爲怪誕而空虛之風格，這是蘇軾所不認同的。總之，就是要在「學」的前提下，充實自我內涵，才能有進一步的「呈現問題」。

有了深刻的內涵，接下來就是「呈現」的問題。什麼是平實、自然？又怎麼樣才能算是平實自然而又富有意涵？其實這在前面已經有談及。蘇軾在〈與謝民師推官書〉曾說：

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⁸⁶

這是蘇軾的「辭達」之說，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蘇軾作文的最高準則就是「辭達」。什麼是「辭達」呢？所謂「辭達」就是指使事物了然於口與手，也就是能經由語言或者文字，將所欲表達的事物，清清楚楚地表達、呈現出來，讓看的人能夠「了然」，能夠明白，這就是「辭達」。當然，做到「辭達」前，也就是使事物了然於口與手前，必須先能使事物了然於心，作者必須先對事物有充分的瞭解，然後才能求把事物表現出來。如果作者對所要表達的事物或感覺，都只是一知半解、模模糊糊，如何能生動、清楚地將它說出來？所以第一步須先使事物了然於心。這個「辭達」之說，顯然地跟取材與表現手法有相當關係。了然於心者，與取材相似，都是關於所欲表達事物內涵層面的問題，而使了然於口與手者，則是表現層面問題。了然於口與手清楚地說明了，表現事物最重要的是要能夠清楚地讓人了解，也就是能夠明確地表達所要說的話，也就是前所說的「意」，這是前提。而平淡之風，就是要先掌握這一點，雖然平淡，但要富有意涵。不能因爲平淡，就沒有內容，真的只是平平凡凡地說一句話，那就會變成前面所說的「中邊皆枯澹」，那是不足道的。所以說，什麼是平實的語言，第一先要把握到，內容絕不是枯澹乏味。那如何不枯澹乏味，就是要多看、多學，從中提煉、轉化出一套自己的語言，即是前所謂「以故為新」、「以俗為雅」。

⁸⁶ 《蘇軾文集》第四冊，卷四十九，頁 1418。

如何轉化、提煉，如何「以故為新」、「以俗為雅」，除了內容要有豐富意涵外，蘇軾還提到了「奇趣」的觀念。奇趣對蘇軾來說，是作詩所不可或缺的，一首詩的好壞，很可能決定於奇趣的有無。所謂奇趣，就是讓人初看之下不識其意，但在反復推敲之後，則意涵便一層一層地顯現出來，讓人有回味再三，不忍釋懷的感覺。〈書唐氏六家書後〉曰：「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⁸⁷指出陶淵明詩之好，好在有奇趣，初看時好像沒什麼特別，但在仔細推敲玩味後，卻發現存在著深刻的意涵，令人驚奇讚賞。《冷齋夜話》卷一之〈東坡得陶淵明之遺意〉中引蘇軾話說：「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讀有奇句。」⁸⁸正是指此。奇趣是需要經過反復觀詳，乃能有所體會，這正是因為它平淡的外表隱含著深切的意義，所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而蘇軾所讚賞的，正是這種讓人回味無窮的作品。

那如何才能有奇趣呢？除了作品本身要有豐富意涵，這意涵也要能出人意表。如果說的都是前人所言，而沒有自我創見，那說得再多也是徒然，都只是依樣畫葫蘆，東抄一些，西抄一點，是沒有可看性的。要有奇趣，要能引人入勝，就必須有本有新，亦即在傳統知識中有所創新。蘇軾〈書柳子厚漁翁詩〉曰：

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趣，……⁸⁹

文中指出，所謂奇趣就在於「反常合道」。什麼是反常合道？既然反常，又如何能合道？常不就是道之所在嗎？其實這裡的反常，並不是反道之常，而是反一般習慣中的常。怎麼說呢？通常人對一件事的看法，會因為某個權威或經典式的說法而趨同，人往往會找到一個最好的見解或理念，然後推崇、追隨，久而久之，就成了經典，成了習慣，成了平常。然而平常的東西看久了、接觸久了，就顯得平淡、顯得乏味，雖然還是至理，卻已沒有吸引人的因子，這就是沒有了奇趣。而一個道理，一個現象，其實並不是非用某個手法或意象來表達不可，表現一件事物，是可以有很多種方式的，在眾人都看膩某個經典式的呈現手法後，如果用另一種出人意表的手法來表現同一個意涵，那將讓人頓覺耳目一新，雖一開始可能因和平常所熟悉的東西不同，而讓人無法立即領會，但經過反復推敲，則能給予更多的驚喜，這就是所謂的反常合道，所謂的有奇趣，反常是反一般世人習以為常的方式，合道則是仍蘊含著至理。所以說奇趣的產生，在於用不同的手法與觀點，呈現出對一件事物的看法，既不違反傳統的不變道理，又能一新人之耳目，從不同角度提出新的觀點，開創新的視野。以上是指內容上的有本有新，不僅要有豐富意涵，還要能出人意表，也就是要有「意」和「奇趣」。然而內容有了，還得表現手法來配合。

⁸⁷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九，頁 2206。

⁸⁸ 《冷齋夜話》卷一之〈東坡得陶淵明之遺意〉：「東坡嘗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讀有奇句。』」節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3 冊，子部一六九雜家類，頁 241。

⁸⁹ 《蘇軾文集》第六冊，《蘇軾佚文彙編》卷五，頁 175。

表現手法上，則要盡量描繪出所要表現事物的特性，讓人一目了然。「求物之妙」是關鍵，什麼是「物之妙」，這「妙」究竟是什麼？其實「妙」指的就是該事物最突出、最有特色的地方。試想，模仿一個人，怎麼樣才會像，最重要的就是要抓住那個人的特色，或者說是某些與人不同的習慣，這就是特點，只要掌握了特點，人家就會覺得像，那個特點，就是「妙」之所在。當然，一個事物的特點很多，也就是「妙」的地方很多，能掌握愈多特點、愈多「妙」的地方者，就能模仿得愈像。寫作也是一樣，寫作其實就是口與手在模仿心所了然的事物，而心則是在模仿外在與心相交的事物，能抓到特點，抓到最能鮮明代表該事物的地方，就是得「物之妙」。所以說，「辭達」在表現手法上，並不求華麗的文字，也不求豐富的詞彙，求的是能講出所欲表達之事物的鮮明特點的文字，這文字可能很平實，可能很平凡，但卻能真切地描繪出所欲表達的事物，能把作者心中的意涵完全地呈現出來。因為是平凡的語言，所以和讀者間不會有隔閡，看起來平平淡淡；但又因為清楚、鮮明地呈現出作者想表達的意涵，所以內容不會枯燥乏味，這就達到了所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的境界，也就是「辭達」。

當然，「辭達」最忌諱的是「因文害意」，也就是過多的文飾，反而妨害了意義的呈現。這有兩種現象，一是所用文字太過華麗，所用語詞太過生澀，使人讀起來生字太多，順暢度不足，這不但不能展現淺詞用字的功力，反而妨礙了意涵的表達。另外一種是說得太詳盡，太仔細，贅言太多，把所有意義都說盡了還在說，這就讓一篇作品沒有了讓讀者想像或思考的空間，作品將失去生命力，且有畫蛇添足之感。所以說「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該說的時候才說，不該說的時候就該停止，該描繪說明的地方作說明，說完了就停止，不需再添加任何贅言。所以說，所謂澹泊、自然、平實而有味外之味的語言，指的就是不要有多餘的話，任何說出或寫出的話都要有其作用。如果文飾能使事物表達得更鮮明，那就使用；如果不能，則無須使用。掌握這原則，自然就能使詩文平實自然而又不枯燥乏味，也就能達到「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的境界。

總之，蘇軾對柳宗元的喜好，在於柳詩的「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一特色。一方面，柳詩乃「有為而作」且含意深遠的作品，一方面柳宗元又運用近於「辭達」的表現手法來呈現其作品，這達到了兼具作品內涵與表現手法的藝術境界，其不僅符合了蘇軾對重學力與重實用的文學主張，也與蘇軾對澹泊、自然的喜好心理相契合。蘇軾對柳宗元的接受與喜好，正是在此。

第五節 對白居易的接受內涵

白居易為中唐詩人，他的詩歌流傳甚廣，影響甚遠，不僅當時風靡一時，歷

五代以至宋初，仍有影響力。元稹〈白氏長慶集序〉即曰：

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謫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泊長安中少年，遞相倣倣，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⁹⁰

由元稹所言，可知白居易詩在當時確實流傳甚廣甚遠，上自王公妾婦，下至牛童馬走，近從長安，遠達巴、蜀、江、楚，皆競作新詞，口無不道，甚至還有人出售偽作。顧陶〈唐詩類選後序〉亦曰：「元相國稹，白尚書居易，擅名一時，天下稱為元白，學者翕然，號『元和詩』。」⁹¹張爲更稱白居易爲廣大教化主⁹²，至宋初，更有白體詩人，以推崇白居易爲尚。由以上種種資料顯示，白詩確實風靡天下一時，甚至到宋初仍有一定影響。在如此眾多喜好者之後的蘇軾，如何去看待白詩？蘇軾對白居易的評價如何呢？

觀蘇軾論及白居易的資料，可以發現蘇軾對白詩其實並不是很喜愛，甚至有貶抑的意味，〈祭柳子玉文〉即曰：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獨以詩鳴，天錫雄味。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嘹然一吟，眾作卑陋。⁹³

這是蘇軾所寫的一篇祭文，其中提到柳子玉的詩時，舉元稹、白居易、孟郊、賈島等作爲比較。蘇軾各用一字概括四人詩風特色，元稹時有作豔詩，故以「輕」稱之；白居易詩通俗淺切，故以「俗」許之，孟郊寒苦，賈島清瘦，姑不論蘇軾的評論是否得宜，其心中認爲四者詩作不如柳子玉是可以確認的，因此才說柳子玉「嘹然一吟」其詩，則「眾作」都顯得「卑陋」了。這或許是蘇軾對柳子玉的溢美，但由此可看出，蘇軾對白詩其實是評價不高的，以致於連今人之柳子玉都不如。何以蘇軾對如此受前人讚賞的白詩卻不欣賞呢？究竟是什麼因素造成蘇軾不喜白居易的「俗」？我們可從宋人重學的審美趣味入手。

隨著重文風氣日益深化，淺白迅速已無法滿足一般士人的審美需求，取而代

⁹⁰（唐）元稹著：《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一版）下冊，卷五十一，頁554、555。

⁹¹（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四冊，卷七百六十五，頁3528。

⁹²張爲〈詩人主客圖序〉曰：「若主人門下處其客者以法度一則也，以白居易爲廣大教化主……」節自《全唐文》第四冊，卷八百一十七，頁3814。

⁹³《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三，頁1938。

之的是講求涵養，重視學力的審美趣味。蘇軾屢論及學的重要，心中那種對集大成者的肯定心理，在面對白居易那種淺切詩風時，自然難以獲得共鳴。雖然蘇軾也喜歡澹泊、自然詩風，但白居易的淺切，並不是蘇軾所謂有味外之味的平淡，而是那種近於「中邊皆枯澹」的平淡，因此蘇軾也僅能以「俗」稱之。

總之，由於重學的文學主張，以及對澹泊、自然而有味外之味詩風的喜好，蘇軾對白居易那種淺切通俗的詩風是不甚欣賞的。然而，我們卻不能因此說蘇軾認為白居易的詩一無可取。畢竟影響蘇軾接受詩人詩作的因素，並非只有這兩點，蘇軾對有志之士的崇敬與對佛的嚮往也都是影響其接受白居易的主要因素之一。

儘管蘇軾對白居易詩評價不高，但對其為人，卻是相當肯定的。蘇軾即屢以白居易和自己相比，認為自己和白居易相似。〈贈善相程傑〉即曰：「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⁹⁴《苕溪漁隱叢話》引《王直方詩話》也說：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為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又「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緣深。」而坡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詩云，在郡依前六百日者是也。⁹⁵

從以上可知蘇軾常自比為白居易，而其相似處則在「出處」，也就是所謂宦海生涯。觀白居易一生，有風光時，有失意時，從「召拜翰林學士，歷左拾遺」，經遭人讒言，「貶江州司馬」，再「轉中書舍人，知制誥」，後因「言視不見聽，乞外，除為杭州刺史」，雖仍復用，皆無大作為，朝廷、地方來來往往，起起伏伏，終不得志。於是「卜居履道里，與香山僧如滿等結淨社」，好酒，自號醉吟先生，喜佛，稱香山居士。⁹⁶從白居易的宦海浮沈與好酒喜佛，與蘇軾可說如出一轍，蘇軾因此而喜白居易也是自然之事。此外，白居易為國為民的耿直性情，以及強調「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的精神，在在符合了蘇軾對有志之士的崇敬心理，也實踐了蘇軾講求實用功能的文學主張。在此情況下，蘇軾自比白居易，認為「樂天心相似我」，也就不足為奇了。這裡的心，指的正是積極憂國為民的樂切之心與晚年好酒喜佛的平靜之心。⁹⁷

有了這層對白居易的自比之情，蘇軾對白居易詩的評價也就不那麼低，除了批評其淺切通俗，對其內容是深表認同的。這情形和蘇軾對待韓愈詩是相似的，對白詩的批評，除了前所述「元輕白俗」以及「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

⁹⁴ 《蘇軾詩集》第五冊，卷三十二，頁 1689。

⁹⁵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一，頁 141。

⁹⁶ 《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九之〈白居易傳〉，頁 4300~4305。

⁹⁷ 以上見解出自日本近藤元粹輯《蘇詩記事》卷上，節自《白居易資料彙編》，頁 43。

爲白樂天爾」外，是很少有微言的，由此亦可見，蘇軾評人詩，是首重詩中的「意」，再論寫詩技巧的。對蘇軾而言，「有爲而作」是作詩文的基本條件，心中有所欲言始能言之，不作虛浮造作之語。語言文字的創作要出於自然，不得不爲的情況下，爲情造文，而不是爲文造情。有了這一作文的先決條件，才來談作文的技巧。而作文的最高境界，則是「辭達」。關於「辭達」，前已做過說明，此處再略提以作補充。「辭達」包含了三個層次：一是「達意」，二是「求物之妙」，三是要有「奇趣」。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曰：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⁹⁸

文辭最重要的是要能「達意」，因此一篇文章中，最重要的是要有「意」，也就是要有內涵。而達意的方法，莫過於求物之妙，要呈現一個意象或事物，若能講出其與眾不同的特點，則就算只是講一個特徵，也能鮮明地呈現出所要表達的事物。如果說的盡是無關緊要的特點，那說得再多，也難以曲盡事物之妙。蘇軾〈評詩人寫物〉就曾說：

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梅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⁹⁹

文中即提到如何盡物之妙，就是要寫到該物的特色，如寫桑，就要描述桑葉的繁盛，而不是寫桑樹的枝幹或其他，葉這是桑樹的主要特色，絕不會和其他樹木混淆。林逋詠梅，寫梅枝的疏橫之影和梅花的清淡香氣，也正掌握了梅樹的重要特點，如是桃、李，絕不會同時有枝與香氣這兩種特色。總之就是要能寫出所描寫之物的特點，這就是「寫物之功」，也就是「求物之妙」。

當然，能掌握事物的特點，還要能推陳出新，寓含趣味，也就是要有所謂的「奇趣」。前已說過，「反常合道」就是趣，要做到用另一角度來觀察與表現所要描寫的事物，在已有的前人基礎中，更添加自己的新意，將其呈現出來，使人看了不會有一陳不變的乏味感，而能在反復玩味時，屢屢得到驚喜的體悟。能做到「達意」、「求物之妙」與「蘊含奇趣」這三點，則可達到蘇軾所言的真正「辭達」。

⁹⁸ 《蘇軾文集》第四冊，卷四十九，頁 1418。

⁹⁹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八，頁 2143。

境界，也就是前所說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的狀態。

由以上對「辭達」的描述，顯然地白居易的詩並未達到此一境界，然而雖未達到此一境界，卻也達到了「達意」的層次。白居易「有為而作」的作品，以蘊含「意」，也就是內涵在裡頭，所欠缺的只是對文字的運用功力。這至少已經邁出了往「辭達」路上的一大步，只要加以時日的學習，必有大成。況且白居易作詩本就不是為了達到至高藝術境界，他是為了表達心中的感悟給老百姓知道，以為借鏡的，基於這一層原因，白居易的詩盡量求老嫗能解，而不是講求文飾之功，因此蘇軾對白居易這點通俗的特色，亦沒有多作批評，反而是大力推崇他「有為而作」這一方面的特點。

總之，蘇軾對白居易詩的接受，雖因其淺切通俗，且沒有展現學力與平淡有味外之味的風格，而沒有那樣地讚賞，但也沒有過多的貶抑之語。蘇軾喜歡白居易，在其擁有一顆與自己相似的憂國愛民之心，而白居易的詩，已達「有為而作」的標準，對於不如陶淵明詩之淡而有味，自然而有韻致，也就不那麼苛求了。

第六節 對其他唐代詩人的接受內涵

除了上述五人，蘇軾於其詩文集中，尚有論及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孟郊、賈島等諸人，雖所言不多，有的甚或僅有一語帶過，難以得知蘇軾真正意圖，但總和起來仍有一定份量，因此這裡一併論述。當中僅能言及粗略，不足之處，待後來人收集更完善資料論及。

一、王維

蘇軾對王維的評論，歷來以王維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最為經典。其〈書摩詰藍田煙雨圖〉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¹⁰⁰蘇軾認為王維的特色，正在於其詩畫是融合一起的，王維擅長用詩中意境取勝，藉無窮畫意來渲染人心，讓人有如臨其境，如享其樂的感受，這正符合了蘇軾「語工」的主張，融合詩畫也符合蘇軾創新的理念。

前面說到蘇軾對王維與吳道子話的評論也說過，王維之所以勝過吳道子，在於王維的創新更勝吳道子一籌，不僅是技法上的突破傳統，更於畫中加入詩意，使作畫者不再是畫匠，而是一個擁有獨立人格的畫家。其〈王維吳道子畫〉曰：

……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

¹⁰⁰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七十，頁 2209。

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¹⁰¹

吳道子再精妙，也只是個畫工，他的畫不是表達自我人格的東西，而是追求形似之極致的作畫者。王維的文人畫則加入了畫者的自我意識，使畫有了生命，這是王維新的突破，也是蘇軾所極力追求的創新精神，由於王維符合了蘇軾的創新精神和語工主張，蘇軾對王維也只能說：「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是難以找出其不佳之處的。

二、孟浩然

關於孟浩然，蘇軾沒有作過實質的評價，只有在詩作中偶爾提到有關孟浩然的故事，例如其〈梅聖俞詩集中有毛長官者，……作詩戲之〉詩中有「不願君為孟浩然，卻遭明主放還山」句¹⁰²，又其〈贈寫真何充秀才〉詩中有「又不見雪中騎驢孟浩然，皺眉吟詩肩聳山」句¹⁰³，〈和魯人孔周翰題詩二首〉詩其二中有「更邀明月說明年，記取孤吟孟浩然。此去宦遊如傳舍，揀枝驚鵲幾時眠」句¹⁰⁴，以及〈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武園亭，寄交代孔周翰〉詩中有「又不是襄陽孟浩然，長安道上騎驢吟雪詩」句¹⁰⁵，這些詩句中透露出蘇軾對孟浩然境遇的惋惜，而孟浩然給蘇軾的鮮明形象，乃是在驢上獨行的孤淒景象。

據《後山詩話》記載：「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爾。」¹⁰⁶又《歲寒堂詩話》說：「子瞻云：『浩然詩如內庫法酒，卻是上尊之規模，但欠酒才爾。』」¹⁰⁷從二詩話的記載，蘇軾對孟浩然當是略有間言，就是惋惜孟浩然詩才太短，就如同造酒沒有材料，這才既然是用造酒的材料來比擬，大概指的就是宋人所謂的學力吧。這學力一來自讀書，一來自人生閱歷，也就是說，孟浩然有詩人的氣質，但讀書不夠，閱歷不深，沒有充分的才學與見識來支持其詩人氣質，所以作出來的詩雖然格韻很高，但卻力度感不足。但孟浩然畢竟格韻高遠，其詩仍有一定價值，因此蘇軾對其沒有說很喜歡，卻也不多作批評。

三、韋應物

蘇軾對韋應物詩的接受，大體是和接受陶淵明與柳宗元詩是相同的，都是愛

¹⁰¹ 《蘇軾詩集》第一冊，卷三，頁 108~110。

¹⁰² 《蘇軾詩集》第二冊，卷十二，頁 583。

¹⁰³ 《蘇軾詩集》第二冊，卷十二，頁 587。

¹⁰⁴ 《蘇軾詩集》第三冊，卷十四，頁 693。

¹⁰⁵ 《蘇軾詩集》第三冊，卷十五，頁 715。

¹⁰⁶ 《歷代詩話》上冊，頁 308。

¹⁰⁷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一版）上冊，頁 460。

其自然、平淡處。其〈評韓柳詩〉中說：「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¹⁰⁸明顯將三人相比，且有三人風格相似，只是略有高低之意。從蘇軾之喜愛陶淵明與柳宗元詩，可知蘇軾對韋應物之詩應該也相當喜愛，因為三者詩風是屬同一類型，蘇軾〈和孔周翰二絕·觀靜觀堂效韋蘇州詩〉詩中即明言「卻愛韋郎五字詩」¹⁰⁹，說出自己喜愛韋應物的五言詩。總之，由於韋應物詩符合了蘇軾對自然、澹泊喜愛的心裡，因此受蘇軾所喜愛。

四、孟郊、賈島

蘇軾對二人的詩，大體來說是不甚欣賞的。其〈祭柳子玉文〉及稱二人「郊寒島瘦」¹¹⁰，說出了對二人詩作的感受，孟郊詩寒、賈島詩瘦，雖未具體言及何謂「寒」？何謂「瘦」？但從〈祭柳子玉文〉中可知蘇軾對孟郊、賈島二人詩作是不稱許的，因此有「噉然一吟，眾作卑陋」之語，噉然一吟的是柳子玉，卑陋的眾作指的即是孟郊、賈島等人之作。

再看蘇軾〈次韻毛滂法曹感雨〉，其中說：「定非郊與島，筆勢江河寬。」¹¹¹這是蘇軾評論毛滂詩歌的話，他用孟郊和賈島與之反比，而說毛滂寫詩的筆勢如江河一般寬廣，孟、賈二人既與之相反，可知蘇軾認為二人筆勢是稍嫌狹窄的。二人詩筆勢狹窄或許是因為時代環境影響，也或許由於二人性格所致，那處於安史亂後的唐朝，國勢已由盛轉衰，往日風光不再，且各地由蕃鎮割據，整個帝國處於極度不穩的狀態，詩人們人人灰心喪志，白居易、韓愈之後更是無人肯再言國事，詩歌內容從愛國激情轉向自我消遣，二人在此大環境中，詩歌創作不得不趨於某些層面書寫的狹窄內涵，因此筆勢狹窄是其特點，也可說是其缺憾，而從此又可知蘇軾寬廣廣博的個性應該不甚喜愛二人詩作。

當然，雖大體而言蘇軾不喜孟郊與賈島二人詩，但也不是通盤捨棄，對於二人某些佳作，蘇軾仍是持肯定態度的。其〈題孟郊詩〉即說：

孟東野作〈聞角〉詩云：「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今夜聞崔誠老彈〈曉角〉，始覺此詩之妙。¹¹²

蘇軾說其在聽了崔誠老所彈的〈曉角〉之後，始覺得孟郊作的〈聞角〉有其精妙處，由此可知蘇軾認為孟郊的〈聞角〉是不錯的。再看蘇軾〈讀孟郊詩二首〉，其一說：

¹⁰⁸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頁 2109。

¹⁰⁹ 《蘇軾詩集》第三冊，卷十五，頁 754。

¹¹⁰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三，頁 1938。

¹¹¹ 《蘇軾詩集》第五冊，卷三十一，頁 1654。

¹¹² 《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七，頁 2091。

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水清石鑿鑿，湍激不受蒿。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要當鬥僧清，未足當韓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不如且置之，飲我玉色醪。¹¹³

其二說：

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飲腸自鳴喚，空壁轉饑鼠。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有如黃河魚，出膏以自煮。¹¹⁴

蘇軾在詩中說自己晚上讀孟郊作的詩，孟郊詩註非常多，細字指字很小，字小是因為註多。因此讀起來非常慢，就像吃小魚一樣，刺多肉少，得不償失，往往花費很多心血，所得只是一點意涵。蘇軾說孟郊詩寒，指的大概就是這種情形。因此蘇軾抱怨著說，人生像朝露般地短暫，何苦花費時間來讀這種寒酸的聲音呢？不如棄之，去喝酒吧！從這裡可以看出蘇軾讀孟郊的詩讀得相當辛苦，甚至想放棄。但接下來他又說，他雖然憎恨孟郊的詩，但卻又作和孟郊相同的詩語，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即是關鍵所在。蘇軾對孟郊並非全盤否定，否則也不會在夜晚還照著寒燈苦讀孟郊詩，而孟郊詩吸引蘇軾的地方，就在於其詩是從肺腑中作出的，也就是所謂的真心話，不是做作得來的。孟郊、賈島雖然是苦心經營其詩作，但那指的是詩的修辭而言，他們所想表達的詩意卻是從心中而來，是有話想說才去經營文字，以求能更深切表達出自己肺腑中言，這仍屬為情造文，因此蘇軾欣賞他們這一點，這符合了他對自然的喜好心理。當然，或許是孟郊、賈島讀的書並不是很廣博，旁徵博引的功力並未到家，因此往往需長時間才能創作出一首感人肺腑的詩作，也或許是這樣的苦心經營文字，雖在詩意上堪稱自然，在文辭上卻時見刻鏤之跡，引起了蘇軾某些程度上的反感，而使總體而言，對二人詩作是貶多於褒的。

總之，由於孟郊、賈島的苦心刻意經營文辭，加上所寫內容狹窄不夠寬廣，導致所寫幾乎千篇一律，讀來又甚費心力而所的不多，蘇軾對二人詩作的評價不高。但二人詩從肺腑出一特點，則稍稍吸引蘇軾注意，為其提升些許好感，但終究是貶多於褒。

五、劉叉

蘇軾對於劉叉的評論，只有在其〈雪後書北臺壁二首〉詩其中隱約有提及，

¹¹³ 《蘇軾詩集》第三冊，卷十六，頁 796、797。

¹¹⁴ 《蘇軾詩集》第三冊，卷十六，頁 797。

其中有「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叉」句，集中王註引《唐書》曰：「劉叉，韓門弟子，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為獨拜。」¹¹⁵劉叉為韓愈弟子，曾寫過〈冰柱〉詩，一時和盧仝、孟郊等齊名。按劉叉的詩敢於揭露統治者的荒淫，所做〈冰柱〉¹¹⁶、〈雪車〉¹¹⁷等詩乃寫百姓遭逢戰亂之苦。其詩四、五、六、七、八、九、十雜言，儼然有李白〈蜀道難〉氣勢；內容多為揭露百姓困苦之事，與杜甫〈兵車行〉相彷彿，可說是才氣縱橫的儒門詩客。雖然蘇軾沒有明顯話語評斷劉叉，但從劉叉詩歌兼具李白、杜甫的長處，不難想像蘇軾對他應是相當讚賞的。蘇軾「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叉」句即用劉叉之事，說自己因老病而詩力減弱，只能空吟劉叉的〈冰柱〉等詩，來一解自我心中憾事。蘇軾這首詩是離開黃州不久後所作，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其滿腔憂國憂民的心難以宣洩，此時儘管離開黃州，仍是處於不得志的狀態，因此對劉叉詩作的敢於披露時政、反映民情想必帶有幾分崇敬心情。由此，我們可以推測，蘇軾對劉叉的為人與詩作，應是相當讚賞的。

六、皮日休、陸龜蒙

對於二人，蘇軾僅在其〈寄周安孺茶〉詩中有「鹿門有佳士，博覽無不矚。邂逅天隨翁，篇章互賡續」句提及，集中馮註引《唐書》曰：「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以詩文著。隱鹿門山中，自號間氣布衣，與華亭陸龜蒙友善。陸號天隨子。」¹¹⁸據《唐書》記載，皮日休居鹿門，與陸龜蒙交好，陸龜蒙即天隨子，蘇軾「鹿門有佳士，博覽無不矚。邂逅天隨翁，篇章互賡續」句乃用兩人友好，詩

¹¹⁵ 《蘇軾詩集》第二冊，卷十二，頁 605。

¹¹⁶ 〈冰柱〉云：「師干久不息，農為兵兮民重嗟。騷然縣宇，土崩水潰。畹中無熟谷，壘上無桑麻。王春判序，百卉茁甲含葩。有客避兵奔游僻，跋履險厄至三巴。貂裘蒙茸已敝縷，鬢發蓬攤。雀驚鼠伏，寧違安處。獨臥旅舍無好夢，更堪走風沙。天人一夜剪瑛柏，詰旦都成六出花。南畝未盈尺，織片亂舞空紛?旋落旋逐朝噉化，檐間冰柱若削出交加。或低或昂，小大瑩洁，隨勢無等差。始疑玉龍下界來人世，齊向茅檐布爪牙。又疑漢高帝，西方未斬蛇。人不識，誰為當風杖莫邪。鏗鏘冰有韻，的皜玉無瑕。不為四時雨，徒于道路成泥糝。不為九江浪，徒為汨沒天之涯。不為雙井水，滿甌泛泛烹春茶。不為中山漿，清新馥鼻盈百車。不為池与沼，養魚种莖成霏霏。不為醴泉与甘露，使名异瑞世俗夸。特朝朝澈气，浩然自許靡間其邇遐。森然气結一千里，滴瀝聲沈十万家。明也雖小，暗之大不可遮。勿被曲瓦，直下不能抑群邪。奈何時逼，不得時在我目中，倏然漂去無餘些。自是成毀任天理，天于此物豈宜有忒賒。反令并蛙壁虫變容易，背人縮首競呀呀。我愿天子回造化，藏之韞櫝玩之生光華。」節自《全唐詩》第十二冊，卷三百九十五，頁 4443。

¹¹⁷ 〈雪車〉詩云：「臘令凝締三十日，繽紛密雪一復一。孰云潤澤在枯，燹爛餓民凍欲死。死中猶被豺狼食，官車初還城壘未完備。人家千里無煙火，雞犬何太怨。天下恤吾氓，如何連夜瑤花亂。皎洁既同君子節，沾濡多著小人面。寒鎖侯門見客稀，色迷塞路行商斷。小小細細如塵間，輕輕緩緩成朴簌。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車盈道載屑玉。載載欲何之，秘藏深宮以御炎酷。徒能自衛九重間，豈信車轍血，點點盡是農夫哭。刀兵殘喪後，滿野誰為載白骨。遠戍久乏糧，太倉誰為運紅粟。戎夫尚逆命，扁箱鹿角誰為敵。士夫困征討，買花載酒誰為適。天子端然少旁求，股肱耳目皆奸慝。依違用事佞上方，猶驅餓民運造化防暑厄。吾聞躬耕南畝舜之聖，為民吞蝗唐之德。未聞壚孽苦蒼生，相群相党上下為蝥賊。廟堂食祿不自慚，我為斯民嘆息還嘆息。」節自《全唐詩》第十二冊，卷三百九十五，頁 4444。

¹¹⁸ 《蘇軾詩集》第四冊，卷二十二，頁 1163。

歌往來之事。按詩中所言，蘇軾既稱皮日休為佳士，又說其「博覽無不矚」，自然是對其學力有所肯定而喜好之，縱然不是相當喜好，也不否定其作品。陸龜蒙既與皮日休交好，物以類聚，自然也不是太糟糕的人，因此猜想蘇軾對二人略有好感應該是說得通的。總之，二人符合蘇軾重學力的文學主張，因此蘇軾對其接受程度尚稱不錯。

第七節 結語

以上是蘇軾對唐代詩人詩風的接受內涵，其中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柳宗元的評論較多，也較完整，因此各自提出作探討，其餘如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孟郊、賈島、劉叉、皮日休、陸龜蒙等則多是零星片語談及，有些甚或看不出蘇軾真正的意圖，因此合在一起概略論及。大體而言，蘇軾是依據其文學主張與接受心理的傾向來對唐代詩人進行接受的，符合蘇軾接受心理愈多者，蘇軾對其則讚賞有加，如杜甫一人就符合蘇軾各項接受心理，因此蘇軾對其評價就相當地高，接受程度非其他各家所能比擬。

當然，隨著個人的成長，蘇軾的接受心理也作了些改變，從對學力與有志之士的推崇，逐漸轉向一種對反璞歸真的平淡詩風的喜愛，柳宗元、韋應物的詩正是在這一轉變下受到蘇軾的喜愛。不能說蘇軾已不喜歡李白、杜甫，而是在蘇軾喜歡的詩風中，又加入了幾種元素，而某些符合這些元素的唐代詩人也在此時被蘇軾發掘了出來，加以讚賞推崇。由此又可證明，對於一個詩人或詩風的接受，並非完全取決於被接受者的詩風特色為何，絕大部分的原因，當來自於接受者本身，接受者隨著年齡的成長，智慧的增長，閱歷的積深，接受心理會有不同的變化，而其接受的對象也隨著變化，就好比年輕時跟中年時、老年時的喜好不同一樣。

對唐代詩人的接受，蘇軾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喜好者，但也有共通者，正如蘇軾心中儒、釋、道三家思想的消長，雖互有消長，卻同時存在。蘇軾的三項接受心理與其他文學主張，是同時存在於蘇軾心中的，只是某個時期某種接受心理高漲過其餘兩種，所以才有不同喜好的唐人應對詩人。意氣風發時，所注意的就是有作為的古代能人；稍感不順時，則對有志之士興起崇敬心理，如對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等的推崇；老來歸於平淡時，則對澹泊、自然興起喜好心理，對陶淵明、柳宗元、韋應物、王維等的喜好隨之而起。這些人都是蘇軾喜好的對象，終身不變，變的只是喜歡程度的消長罷了。總之，蘇軾對唐代詩人的接受，隨著其接受心理的消長而有所不同。

如上所說，蘇軾所稱許的典型，大概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傾向儒家積極入世、

憂民憂國的典型，一類則是傾向佛老澹泊歸隱、熱愛生命的典型。這兩種典型都是蘇軾所認同、推崇的，如前所言，只是喜歡程度的消長，並沒有消失。蘇軾早年及中年，因入世的心非常熱切，所以對那些有為於世或有志於世的前人有相當大的傾慕感，所接受的也多是這一類風格的詩作；當然不能說對歸隱思想、逍遙思想不能接受，只是境遇及本身思想建構的影響，對儒家入世精神似乎熱愛些。然而，隨著年齡增長，經驗及智慧的累積，境遇的一再變動，導致蘇軾思想上有所改變，對世事的看法也愈見透徹，對佛老的浸淫日久，對儒家思想的體會漸深，不免轉而喜愛另一種曠達、逍遙以及熱愛生命、認真生活的思想。當然，喜愛曠達、認真生活之餘，對儒家入世愛民的思想並未消失，只是更看清現實，轉而以另一種方式面對這滿腔無處可洩的熱血：或提攜後進，或與民同樂，或以自身為則，留下千古傳誦名篇。

對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等的推崇，正是蘇軾推崇有志之士，熱切儒家入世思想的體現。除了大量的論政文章，在失意之時，與這些有志於世的古人隔空對話，正是蘇軾用以宣洩滿腔無可宣洩之熱情的方式。李白雖是道家人物，但蘇軾對其俠義愛民的精神，更是稱許有加；杜甫用血淚寫下唐史慘痛真實的一面，其對人民真摯的情感，正與蘇軾產生共鳴；韓愈的登高一呼，「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更是蘇軾讚不絕口的傳道之人。白居易的文章合為時而作，不講虛浮空洞之文，也符合了蘇軾有為而作的基本作文理念。這一切都是一種愛民的表現，姑不論蘇軾是否有意製造出一條含有儒家入世精神的創作之路，但他確實從唐人中找出了一條這一類的文風，他們都有愛民為民的基本精神，經由蘇軾的提出、讚揚，這一類風格作品更加集結化，更成為一股力量，為唐代詩史的接受寫下新的視角。杜甫的日漸受到重視，韓愈的貴為一代之尊而不朽，蘇軾或多或少都有些功績。

至於另一個典型的成立，蘇軾的貢獻更是良多。在中國詩史上，詩以言志本是常態，詩以緣情是後來加上的。隨著時代發展，詩歌從反應時政，到抒發己意，到雕刻篆鏤；從重道、崇文，到文道並存，其中經歷了無數次的爭論、辯駁。蘇軾以其流水般的文風、超越的思想，終於發展出一種平淡而含味外味的風格，這是一種大巧歸樸、積學反真的境界。陶淵明做到了，柳宗元做近了，韋應物跟進了，但是他們都沒能有這層欲將之發揚於後世的自覺，更別說形成一種典型風格。蘇軾在其歷盡滄桑，學盡古今之後，終於體會到這境界的美，從而提倡之。陶、柳、韋三人的詩風，都傾向澹泊、自然而有味外味，經由對這些人的推崇，蘇軾開創出了一條不同於以往講求華麗、講求載道、或講求愛民愛國的詩作風格，而是以清新、平淡、雋永而發人省思為主的風格。這對唐代詩史的建構實具有一定的影響，柳宗元等的受人重視，正是蘇軾極力運作下的結果。

總之，蘇軾依其接受心理，至少發展出兩種不同風格的詩作典型，這些典型

的提出與形成，對唐代甚至整個中國詩史都有莫大影響。這兩種蘇軾所推崇的典型，隨著蘇軾的為人所大力接受，也跟著受到後人的矚目，蘇軾對中國詩歌的接受史，實有他人所不及的影響力。